

第二章

家里没人

大山沟里的死亡

山秀珍十二岁时，父母把她送去跟未来的公婆一起住。¹ 当时是 20 年代中期，陕西省正遭大旱。秀珍的父母担心一旦她未来的丈夫饿死，她会嫁不出去。他们盘算着秀珍丈夫家能养大她就更好了。如果将来两个年轻人都能活下来，他们俩就可以正式成亲。

秀珍未来的丈夫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家离礼泉县秀珍的父母家北屯三十里（约十英里）远。² 大多数年轻姑娘都不会嫁到离父母这么远的地方去，但这两家都信基督教。³ 早在几年前，这门亲事就由李媒婆撮合了，她一个劲地说董家有多么多么好。然而就在秀珍快要去跟公婆一起住时，她哥哥去了一趟山里换粮食，回来之后便满腔怒火。他对秀珍的母亲说，“你这下把你娃给瞎啦，给瞎啦（注：不好），一下给到顶天寺西北山上！”

当秀珍的母亲把她送到新家时，心里充满了歉疚和悔恨。“咋把女子给到这高山上去了。连门都没有，没有，烂窑窑子弄个笆笆子一黑挡在门上，光有个锅。”⁴ 然而，她还是依照承诺把秀珍留在了那里。

当干旱加剧变成饥荒，悲剧降临到两家头上。秀珍的父亲死了。哥哥应征加入国民党军队并在第二次逃跑时被射杀。在那之后不久，他的妻子也死了。只剩下秀珍的母亲一个人离家去乞讨。当时全县一半以上的人都死了或者逃了。

¹ 官方资料说山秀珍生于 1913 年。见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3 年：第 512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潼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卷首插画，第 3 页；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 年：第 13 页。如不另加说明，所有关于山秀珍的信息均来自我们 1997 年与她的访谈。

² 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 年：第 14 页。

³ 1911 年，美国基督教协同会派了两位瑞典新教传教士到礼泉县并建立了两座教堂，一座在县城，另一座在秀珍的家乡北屯。然而，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全县也只有约 400 名新教徒和 650 名天主教徒（礼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 年：第 888-89 页）。

⁴ 如今的北屯为礼泉县东部边界的一个乡，距西安西北部 35 公里。从该县的地形图上确实可以看到北屯北部高山耸立。现在这一整个地区归咸阳市管辖（陕西省地图册 1991 年：第 5-6 页；礼泉县地方志 1999 年：卷首插画地图）。

河流和井水都枯竭了。庄稼都旱死了，地里什么也不能种。依旧一滴雨也没有。

5

到了1929年，这场让秀珍提早成亲的大旱已经迫使整个关中和陕南地区近八十万离开家乡去寻找食物。⁶ 饥荒第二年，全省超过七百万人受到影响，到了是年年底，仅关中地区就有三百万人死亡。⁷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关中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势力。军阀们已经侵吞了农民大部分的储备粮，也没有地方政府安排提供救援物资。⁸ 1929年，一家主要报纸报道了一则骇人的事件，说陇县有个饥饿的父亲将十二岁女儿吃掉了。陇县位于甘肃省的边界上，距离秀珍家乡西北部160里。第二年，涌现了大量关于陕西饥民吃道路旁尸体或把新葬的死人挖出来吃的报道。⁹ 河床干涸，马车皆可由河道通行，庄稼旱死在地里，在陕南，饿疯了的乡民们把树皮都剥光了。¹⁰ 饥荒迅速对西安的北部和西部产生了严重影响，¹¹随着饥荒的加剧，山秀珍并不是唯一一个远嫁的年轻

⁵ 1925年初，礼泉县雨水很少，夏天的收成不足。但最严重的干旱始于1928年。据县志报道，1929年夏和秋颗粒无收：“日毙饥民累百盈千，赤野千里，卖儿卖女，四散逃荒。”全县129,000人口中有66,000死亡或逃离。干旱一直持续到1930年，雪上加霜的是，1931年爆发的霍乱又致使5000人死亡。1932年和1933年，干旱仍旧持续（礼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年：第148、293页）。从1928年到1933年，救济机构分发粮食、种子、面粉、衣物和救济款，但据说大部分都被政府官员和商人挪用（第753页）。

⁶ 夏明方2000年：第90页。从1912年到1948年间，陕西有记载的灾害大小共1,233起，包括洪灾、旱灾、虫灾、风暴、雹灾、冰冻、地震、时疫，以及“其他”灾害（从暴风雪到矿井灾害和山体崩塌）。在这些灾害中，旱灾569起，洪灾346起（第34页）。一份1936年关于各省的农民为何都在1931年和1933年间离开家乡的调查显示，有两大原因致使陕西农民背井离乡，一是自然灾害（34.6%）；二是“土匪”，当地战争也包含在内（28.5%；第101页）。弗美尔（[Vermeer] 1988年：第30-31页）写道，关中的农业几乎都只靠降雨，干旱是导致饥荒的最主要原因。干旱甚至延及陕南那些通常易发洪水的地区（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编纂组1990年：第70页）。有关1876年至1879年华北的大旱灾和饥荒及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影响，见何汉威1980年。陕西1898年至1901年间的大旱灾和饥荒致使约二百万人死亡，见尼可尔斯（Nichols）1902年：第228-41页。有关渭南地区从上古时期至1989年的旱灾、水灾和雹灾简史，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743-51页。有关对20世纪30年代陕西灾害的同时期报道，见《西北向导》1936年：第9期（6月21日），第32页；和第15期（8月21日），第221-26页。

⁷ 夏明方2000年：第90页；曹树基2005年：第23页。大旱蔓延至陕西、甘肃、绥远、陕西、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1929年，中西救济会（Sino-Western Relief Association）报道说有六百万人死亡（方德万[Van de Ven] 2003年：第131页）。1932年，潼关一个地方上的仕绅对一个外来者说，大干旱导致许多人都将女人和女孩卖到陕西以外，很可能会影响该省的男女比率（并暗示也会影响男人的婚姻前景；郭步陶1932年：第52页）。

⁸ 弗美尔1988年：第28-38、45-46页对这种情况作了全面的讨论。

⁹ 夏明方2000年：第410页。《大公报》最先报道了这些故事。

¹⁰ 南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第141页。

¹¹ 弗美尔1988年：第34、408页。弗美尔还引用了一份1938年对关中的调查，调查显示，陕西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缠足率、男女比例，北部和西部的死亡率依然很高，教育覆盖率也更低（尽管两个地区受教育妇女的

姑娘。¹²与更小一些的女孩相比，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更幸运，前者经常被卖掉、遗弃、或杀死。¹³

而与此同时的大山深处，秀珍在十五岁的时候正式成亲了。比她大九岁的丈夫¹⁴离家去找工作。身患绝症的公公躺在炕上要一碗面水子喝，但家里却一颗粮食也没有。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秀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两眼含泪：“我看他不大行啦，不行啦那咋弄，没有得啥嘛，你说你小娃家你都逃走了，你把当家（注：老人即父母亲）没关到坟里头，天理何容你呢嘛？”秀珍从邻居家借了一些铜钱，¹⁵往返五十里去一个有市集的村里买了一把小麦，用碾子碾碎，竹筛筛好，做成面水子。“我说：‘大，我给你端的面水子，你喝上一点点。大！大！’不会说话啦，心里知道，眼泪咕漉咕漉的（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哭），没喝，没喝，到黑了就死了（注：黑了指晚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秀珍的丈夫才返回家中买棺材葬了他。

第二年，秀珍的婆婆在附近一个沟沟里走亲戚时病倒了。等到秀珍得到消息翻过山的时候，她婆婆已经死了。秀珍又捎口信给丈夫让他买一副棺材回家。“搞的（注：凑和）买一副板抬到那儿去，把我妈就在那看的一入殓，回来挖了个坑坑子一埋，这下对了。”秀珍当时十七岁，饥荒正进入第五个年头。她完成了照顾公婆的责任并体面地安葬了他们。

秀珍和丈夫动身离家，首先去她的娘家。能逃的都逃走了，她娘家的房子已经废弃无人住。夫妻俩继续往前行，沿路乞讨。没有人要雇人手。春节来了又走了，礼泉县依然被大雪覆盖。其他人警告秀珍夫妇说，如果他们俩想要穿过秦岭，会活不下来。但秀珍知道，如果不走他俩会饿死。

人数都极低：东部 2.9%，西部 0.1%）。蒋捷（音译），“关中农村人口调查”，《西北农林》第 3 期（1938 年 7 月）：第 53-54、102、126、156 页，引自弗美尔 1988 年：第 408 页，508 页注 74。

¹² 同样生于礼泉县但比山秀珍小十岁的杨惠娥，七岁就被卖到了两百里外合阳县的一户人家。1929 年，未来全国劳模张秋香被父母从泾阳县东嫁到了渭南。未来的地方劳模鲁桂兰，被父亲放在箩筐里用扁担从兴平挑到了咸阳，最后八岁便成了童养媳。她的嫂子也是一个难民，被她丈夫家从路边拾了回来（与杨惠娥 [2001 年]、张秋香 [1996 年]、鲁桂兰 [1996 年] 的访谈）。

¹³ 大饥荒结束后，1936 年在关中进行的两份调查显示，男女比例在一些地区达到了 118.5: 100，大饥荒年间出生的年龄段的人高达 129: 100。弗美尔（1988 年：第 32-33 页）概括了这两项调查的结果。

¹⁴ 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 年：第 14 页。

¹⁵ 同上，第 15 页。

陕西农村妇女讲述的 1949 年之前的故事受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中共干部组织和鼓动的公开“诉苦”做法的影响。通常都是国家干部让贫农和妇女在公开场合进行诉苦，旨在瓦解地方上层的权力，为新政权获得支持。诉苦目的在于动员听众，让他们对什么是许可的以及什么是可行的有新的认识。¹⁶ 诉苦意在通过叙述的行为，把讲述者从一个接受悲苦命运的人，改造成一个超越这种命运、并走向更美好将来的人。诉苦故事就其定义来说，是对特定的压迫者进行指责和揭发，更笼统地说，是对压迫者所在和统治的“旧社会”进行谴责。¹⁷ 诉苦的故事往往在 1949 年共产党到来（即“解放”）后结束，因为“解放”宣告了农村人民、尤其是农村妇女苦难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¹⁸

诉苦不仅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出现。这种做法在集体化时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来那么一次，**在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有时甚至还表演给外宾看**。诉苦的叙述传统并没有从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消失。这些传统持续对那些曾经诉过苦楚、或曾听过别人诉苦的人的记忆及自我看法产生影响。诉苦已经变成了某个年龄阶段的妇女谈论她们早年生活和过去自我的一种方式。

本章首先记述解放五十年后的故事是如何讲述“苦难”的。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陕西农村生活极为不稳定——政治掠夺、物资匮乏、全面的战争——都对妇女和女孩有特殊的影响。妇女们谈到逃荒、家里家外的劳作、家里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来自猖獗的土匪和士兵的残暴行为。以山秀珍的叙述为试金石，本章的报道延伸触及到四个村庄的妇女们讲述的故事。本章追问，如果我们严肃对待这些流动的妇女的详细记述，我们能对妇女们 1949 年前的生活，以及解放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哪些方面没有改变这些妇女的生活等问题有什么了解？

诉苦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悖论。妇女们经常强调，封建的社会规范把她们禁锢在家庭内，还称这种禁锢是她们苦难的根源。然而，她们关于解放前数十年的故事中却尽是东奔西走的细节：逃离饥荒，在田地里劳作，到市集上去卖纱和布，惊慌失措地逃到田地里和山洞里以躲避强盗。这些故事的细节削弱了诉苦的故事主线，也动摇了党和国家关于革命使妇女得以摆脱家庭的压迫禁锢、可以外出自由活动这一论断。尽管如此，诉苦故事道出了一个更大的真相，那就是，妇女是怎样理解革命对她们产生的影响的。在革命赋予她们的历史情境中，她们常常将自己放置到壮烈的、引人注目的场景中，放到大事件的中心位置。但她们直到很久以后，才充分理解这些大事件的意义。在她们的故事中，她们变成了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¹⁶ 韩丁（Hinton）1997 年；安德训（Anagnost）1997 年：第 28-44 页；马兰安（McLaren）2000 年；郭于华、孙立平 2002 年。

¹⁷ 诉苦与一些革命前的题材有重要联系。马兰安（2000 年）将诉苦与哭嫁作了比较；我们也可以从女人公开抱怨或表达愤怒如“骂街”（明恩溥 [Smith] 1894 年）追溯出诉苦的源头。非常感谢曼素恩向我提示后两者的相似性。

¹⁸ 描述了陕西关中的解放前时期及其对一个特定家庭的影响的经典小说是柳青的《创业史》（1996 年：第 1-18 页），英译为 *Builders of a New Life*（1977 年：第 1-19 页）。亦见陈忠实 1993 年。

可以诉说的苦难

在妇女们的诉苦故事中，有两个词反复出现：“恹惶”和“封建”。“恹惶”（陕西方言）是一个妇女们经常用来描述她们的童年和家庭境况的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患病、被卖、面临危险、亲人丧亡。诉苦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模式，而非脚本。丧失亲人的故事十分个人化且详细具体，甚至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感情上依然难以让人叙述或者倾听。说一个人的过去“恹惶”，便给了这个人在混乱和战争中度过的童年及少年时代一种秩序。它为原本可能无法言说的创伤提供了一种发声的语言：¹⁹所爱之人的死亡和消失，亲人的亡故及分离，来自亲近之人或是陌生人的虐待，性侵犯，还有如下的危险：匪患、征兵、疾病、可以瞬间摧毁一个家庭的意外、或让全家人慢慢死亡的饥饿。

“恹惶”被用来描绘妇女、男人和孩子所受的苦难，但“封建”却总是被用来描述女孩和妇女的状况。她们将以下针对妇女的规定和准则统统称为封建：要裹脚（通常由母亲裹），要在父母挑选的时间嫁给父母挑选的人，要恭顺地侍奉丈夫和公婆，不要插手家里的财务，最重要的是，要一直待在家里。妇女们记得自己如何躲在家里，远离别人的视线。一个村的一个妇女说，那往日那女子坐到楼上做活咧。而事实上，那个村的房子根本没有楼上，只有一个很浅的储藏室。都不到……底下都不叫见。²⁰家庭暴力和社会成规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男人生气打女人，女人生气男人打。²¹年长的妇女是把关人。母亲让十几岁的女儿躲开别人的视线；婆婆允许儿媳回娘家探亲。²²如果局面变得难堪，那么一个女人唯一的办法是：吃点烟，再喝点醋就死了。²³

妇女们用一句俗谚和一则轶闻——两者都是来自1949年后的事后描述——来概括这种束缚在家的情形。俗谚大意是：“再好的婆娘围着锅台转，男的再差走洲过县。”²⁴轶闻讲述的是，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家，每当有人走

¹⁹ 费修珊（Felman）和劳德瑞（Laub）（1992年）详述对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时，描述了叙述此前并未得以发声的创伤性事件的困难之处，因为这些创伤性的事件被经历为“排山倒海的惊吓”（第57页），而非一个已知的事件。据劳德瑞描述，幸存者害怕叙述这些事件会使它们以一种难以忍受的方式被重新经历。虽然大屠杀和1949年前中国农民历经的苦难之间有明显的历史差异，但至少有一点相类似：叙述难以承受的失却的能力为“重新占有”（第91页）离散失却的经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诉苦应被视作是一种具有深刻转化性的做法，而不是一种程式化的政治表演。

²⁰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²¹ 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

²² 与何改珍（1999年）、张秋香的访谈（1996年。）

²³ 与庄小霞的访谈，1996年。鲁桂兰（1996年访谈）也提到了吞鸦片自尽。

²⁴ 曹竹香（1996年）、庄小霞（1996年）、王梅花（1996年）、王妮兰（2006年）、何改珍（1999年）、刘真西（男，2006年）等在与我们的访谈中也说到了这句俗谚。妇女属于家庭空间这个观点也体现在对男人和女人的称呼上。妇女通常被称为“屋里人”，这种说法在汉语中很常见。但关中地区，尤其是渭南和合阳的方言里也将男人称作“外前人”或“外天人”（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805页；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第794页）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外前人”注解为“丈夫”。我们访谈的妇女们经常用这些称呼。

近这户人家、问是否有人在家时，这个女人都会回答“家里没人”。农村妇女们在讲述自己的时候并没有说起这个轶事，但她们的女儿却用这个趣闻来概括她们母亲在 1949 年前愚昧无知的状态。妇联的干部们也提到，当她们在 1949 年和 1950 年挨家挨户开展动员妇女的活动时，妇女们也处于这样一种蒙昧状态。²⁵ 讲故事的人总是将束缚在家的寓意说得很清楚：禁锢在家意味着妇女自己或者别人都不把她当人看。妇女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

如“恹惶”一样，“封建”一词并不是只存在于解放前；我们在关于解放后社会的故事里，特别是有关对年老的公婆或落后丈夫的态度时，会发现“封建残余”这样的词。然而，不像“恹惶”，“封建”一词总是处在不断被取代的过程。故事说，解放后妇女不再被束缚在家里。革命赋予了她们另一种独特的人格：她们能安全地进入非家庭领域，为经济做贡献并主动参与政治。出去开会和上班、在田地里劳作、对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有发言权、成为妇女干部或劳模——这一切都取决于她们在乡村的空间里活动、有时甚至超越这个空间的能力。

诉苦故事暗含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并暗示了二十世纪初的可怕苦难的终结。如果把这些故事看成一个类型，则它们都有相同的叙事弧：“恹惶”是问题，“封建”是问题的根源，“解放”是解决方案。然而，虽然这个公式化的提法很有力，但这些故事的细节传递出的信息通常比这个叙事弧透露出的信息要更为复杂。尽管诉苦的故事线强有力，但它却几乎没有突出那些使农村妇女“恹惶”的重要构件：身强力壮的男性亲属的缺席、带威胁的陌生男人的存在；喜欢压榨的国家官员、国家并未提供任何救济；要求妇女几乎只靠她们自己的劳动谋生、并为孩子提供吃穿。“恹惶”并不总是像故事讲述者说的那样，只属于解放前的过去。它有力地描述了集体化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妇女在谈当下的改革时代时也频繁地用到这个词。本章探讨 20 世纪 20、30 和 40 年代的“恹惶”状态，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未结束。随后的章节会讨论妇女们将她们在 1949 年后的生活理解为“恹惶”的时期。

与此同时，“封建”以及有关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的故事套路却总是与妇女们讲述的故事细节相矛盾。山秀珍辗转各地的经历表明，30 和 40 年代的女子通常并不束缚在家庭空间内。她们在混乱的外面世界奔波流离，不过这种身体上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解放和摆脱束缚，而是意味着艰辛、危险、抛头露面和羞耻。很多妇女都记得，她们童年的部分时间都是在逃荒的路上度过的。有些则永远离家，被卖给不那么拮据窘迫的人家当“童养媳”。抚养一个“童养媳”的代价要比娶一个成年媳妇的小得多。

那些在母家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女孩们许多都回忆说家里当时并没有壮年男子。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们有些死了，有些远离家乡找活计，有些则被军阀或国民党的军队强行抓壮丁，有些为了逃避征兵消失了，有些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妇女和女孩们只得自谋生计，并不得不“外出”去耕种、出售她们的纺织品、乞讨、或以其他方式竭力勉强度日。女孩和妇女们对关中和陕南地区的家庭经济贡献巨大，她们通常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们有些工作（主要是纺织生产）在家里进行，但只有家庭条件较好且男人又在家的妇女们能够奉行这种隐居在家的模式。隐居在家代表着一种贫穷的妇女无法获得的特权。

²⁵ 王梅花（1996 年访谈）、刘招凤（1996 年访谈）、王妮兰（2006 年访谈）都说到了这则轶闻。

在诉苦的叙事中，有一道明亮的分割线将恹惶和封建的状态与人的状态区分开来。那就是“解放”，这个词通常指各个地方共产党的到来，更广泛意义上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同样地，故事的细节使故事线变得复杂。对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一开始并不认为共产党部队的到来跟之前经常来的其他军队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社会变得稳定、有秩序，共产党的到来才被记忆为“解放”。

逃荒

那秦岭冰绉子哟，把多少哎哟都滑的，一走一绊子，一走一个尻子墩（注：摔倒在地上），我那小着也结实，一天也就是在那个山里跑的锻炼，身体也好，也结实，我12岁啦就担水哩，我也没栽。

翻过秦岭一直是那碓碓路，不敢走咧，没有宽路么，就顺着走，晚上也没处住，我那一晚上在阿达（注：那儿）住着呢，连碎碎一点地方都没有。

那是正月二十几，我就在那统身沟那边，雪特别厚，晚上也没有月亮，那个大水呼呼的不敢走咧，晚上都在一个庙里住着哩。我摸哩半路上，那儿有个台台（注：台阶）就把那台台上的雪一扑籁，我也不知道那儿住的是谁，黑了都在那住着哩，第二早儿起来，那个角角那个老婆：唉哟（哭）我连我妈就抱在一块（哭）。唉！不敢提历史，连我妈抱一块娘们（注：母亲及儿女）才见面啦，娘家就丢（注：没有）我妈啦，就丢我啦，就我两个啦。²⁶

经历了与母亲不经意的重逢之后，借着晨曦，秀珍才头一次看清楚了她们的临时床铺。

一个台台你说那是个啥，一个人死了在板里头装着哩，在那个厝着哩，外面用薄薄一点泥泥着哩，三个活人就在那死人上面睡了一晚上。

我第二早儿起来，转黑了没处睡，南山没有庙，没有烂窑窑子，烧木碳的窑，那到黑了没有人了，我老汉、我妈、我三个悄悄地到那烧木炭那窑钻一晚上，早儿起来早早就起来了，认人见了那就不得了，那儿人最封建，南边人（注：陕南人）南山人最信神信鬼啦。

我一辈子我没过香，我没给神庙里烧过，没烧过香，我没烧过，我不信。有啥神哩嘛，啥鬼哩嘛，都是人，人，做好事就是神，做坏事抢人（注：抢人东西），抢人、偷人就是鬼。

回顾往事，秀珍强烈反对有关鬼神的封建观念。大饥荒迫使她在各种奇特的地方过夜，那个时候，她的基督教信仰——后来被共产党谴责为“封建的”

²⁶ 一篇由中国的官员写的、比我们的访谈早五年的采访说，秀珍与母亲是先在一个庙里重逢，然后才翻越秦岭（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年：第15页）。

——让她在见到棺材和阴森可怖的窑洞时得以保持镇定。但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秀珍把几十年的时间压缩到一块，直接从鬼神跳到耶稣再跳到共产主义。她解释说她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家里人都信：我母亲信教，我婆家我母亲也信，为啥我没给庙里的神烧过香，基本上我不信它（笑），那时候就信耶稣，信主，信的信的，给给那家后，我就跟上我母亲一天听礼拜。

解放后啦，我有一点疑问，我说想到这，这社会就是个活天堂，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就是个活天堂。我因是这个（注：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谨常就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²⁷ 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娘、婆两家子活 60 岁就是高寿，我活 80 岁，这还不是（注：就是）党给二次生命嘛。

对秀珍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她的信仰和她对“封建”的理解在不断发生变化，她自己的性格却没有改变。她思想的转变——从基督徒到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让她否定曾经的自己。也好像过去，我也不会封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解释自己结婚时没有索要耳环的事。人说旧社会那时候封建呢，咱没封建过。她讲述的生活包括了个人的英勇功绩和让人无法想象的社会变革——她自己就经历了从一个逃荒的难民变成被毛主席接见的劳动模范的过程。她的叙述提到，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妇女从一个被封建主义束缚的世界走向一个由共产党积极塑造的世界。而秀珍自己的性格却始终如一。²⁸ 通过戏剧化的场景——其中不乏寒冷、饥饿、黑暗、鬼魂及亲情的救赎力量，她讲道，早在世界接受和认可她之前，她就已经表明了自己大无畏的勇气并愿意挑战已有的信仰。似乎世界是追赶她的脚步到达了解放，而不是解放改造了她。咱没封建过。这句话所呈现出来的连贯性以及它所表达出来的自我意识，让秀珍得以将自己较远的和最近的过去联系起来，去接纳诉苦的故事主线，但却不会认为自己为封建主义所摧残。确实是受压迫，但并没有被摧残。对于一个认同革命的妇女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但这也使人们对典型的身处幽闺的妇女形象产生了疑问。在那种形象中，妇女只有在共产党到来之后，才得以“迈出家门”。

然而，在 30 年代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对秀珍来说依旧是很遥远的事。年轻强壮的身体和结婚后苦日子的磨练让能够她徒步穿越秦岭并坚强地活下来。

²⁷ 这是毛时代一个很流行的口号，也是一首歌的名称。

²⁸ 克罗尔（Croll）1996 年指出，来自中国上层精英家庭的妇女在自传中也用自述的模式来作为一种反抗。卢萨·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 1987 年：第 61 页）在对都灵的工厂工人的研究中发现，固定的身份认同“可以被视为是口头叙述中自我表述的一个具体特征”。亚历桑德罗·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199 年：第 53、61、118-30 页）在对工人的采访中也发现叙述者们有时将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区分开来，有时在“我一直有斗争精神”（第 127 页）这类陈述中提供一条“稳定和持久的脉络”（第 126 页）。诉苦故事看起来适合用来去讲述戏剧化的性格转变，但事实上固定的身份认同的陈述在我们的访谈中更常见。

她还要负责让母亲也活下来。一起到南山，我妈老啦跑不了，我老汉是个小伙子，他不理，就是我一天要的养活哩，我要下那菜啥我都吃啦，要一点面面子（注：面粉）放大到河坝支个锅做一点饭叫我妈吃。他们三个终于走到了秦岭南麓的柞水。在一个废弃的猪圈里住了三个月后，一个曾施舍过他们的好心妇人，帮他们在一个富足的余姓地主家找到了活干。

秀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家，主人在七个县都有租收。²⁹ 主人家的女人们都带着锄子，穿着缀银的鞋子。她母亲帮这家人看孩子，秀珍则负责缝衣制鞋、碾粮食、上山割猪草，换来一天两顿玉米粥。³⁰ 为了满足余家的苛刻要求，秀珍完善了针线功夫并得到主人家的褒奖，说她的针线活做得比之前的那个女孩要好。

不会再濒临饿死的边缘了，余家也从来不打她。但秀珍把这段时期说成是她生命中没有什么人格的一段时期。我装聋子，装哑巴，装瞎子，你骂我，我就装聋子没听着。看着啥事情不平不等，想说话不敢说，就不说了，装瞎子，看着那事情做的香脑子通不过，那你只有眼窝挤下（注：眼睛闭住），就这样在他屋里奴了三年。

当秀珍听说礼泉和咸阳又有了雨下的时候，她跟余家说想要回家。这时地主余已经替秀珍和丈夫盖好了两间茅草房，并安排她去一个姓方的村长家工作。她怀疑余想让方将她的丈夫收为养子。方的独子是个聋子。她跟丈夫说，如果不快点走，他们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我想这不对，我还有我屋里呢，我（注：我们）年馑不遭了，我还有我老人呢，我还有我先祖呢；我不能就在这丧了良心。方不愿放他们走，但是秀珍向他保证说她只是想回家看看。

当秀珍和家人返回到礼泉娘家的时候，发现以前住了五百户人家的村子现在只剩下二十个人。一百多座房子也没有了，被路过的逃荒难民或落脚的人拆毁了，正慢慢地消失。在那个基本被废弃的村庄被频繁出没的强盗土匪骚扰了一年后，他们逃到了到上韩的山区，那个地方处在秀珍的娘家和婆家的中间地段。1936年，秀珍产下了第一个孩子；一直到1947年，她又生下四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是活到了成年。

1935年左右，在秀珍从余地主家回来后住在上韩的时候，她看到共产党八路军一小队战士牵着骆驼经过。他们走得很快，留下一堆红红绿绿、贴得到处都是的标语，标语写着“抗日救国”。这些士兵没有停下来，也没去任何人

²⁹ 根据土地改革时期收集的数据，1949年，秀珍家乡礼泉县十八万人中只有约三千人（或二百四十户家庭）被划为地主，四千人（或三百户家庭）被划为富农。平均每个地主占有的土地达到了13亩，而贫农、下中农（四千多户家庭，九万多人）的平均土地占有量为两亩多一点。一万多户家庭中的三万七千多名中农占有的耕地超过50%。地主和富农仅占总人口的4%，但他们却占有约30%的耕地（礼泉县地方志1999年：第294页）。然而，由于地主的人数很少，秀珍不太可能跟地主家庭有太多接触。

³⁰ 据一份已发表的与她的采访报道，她为地主家的小妾做饭和针线活，她的丈夫则为地主家干农活，她母亲给小妾的嫂子跑腿办事（张如云、张自强、赵国玺，1992年：第16页）。

家里，但是秀珍很害怕。她把粮食都收好，一直等到他们过去。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共产党。

到 1938 年初，秀珍一家又搬到了陕西东部边缘的潼关县的太要。这里是她丈夫家的祖籍。在他父母搬到西边的顶天寺之前，他祖父母曾住在这里。秀珍和丈夫在太要联络上了一帮亲戚。³¹ 对他们来说，因为跟亲戚们有联系，潼关比秀珍那饱受蹂躏的娘家村庄更安全。但潼关那时是陕西是最危险的几个地方之一。日本军队正猛烈向中国北部行进，就在黄河北边的邻省山西扎营。³² 秀珍到达潼关两天后，日军很快就穿过黄河，轰炸了潼关火车站和去西安的路，想要在陕西建立据点。很多人和牲畜都丧生了。³³ 作为回应，整个 1938 年国民党军队在都密集在黄河南岸，轮换固守，隔着风陵渡发起进攻并阻断日军渡河的企图。³⁴ 日军没有占领潼关，但是占领了潼关的周边地区。而国民党军队的纪律问题和他们的物质供应需求让当地百姓的日子十分难过。³⁵

秀珍的丈夫很快应征加入战争，当了一个传令兵。她和年老的母亲在丈夫的老家安定下来。（直到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秀珍才知道她和家人为了获得这块土地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她也租了一些土地。她母亲不久后就死了。对秀珍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支撑下去并养活五个孩子。她丈夫在这段时期很少回家，秀珍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裹脚和农活

山秀珍将近十岁的时候，她母亲才开始帮她裹脚，但秀珍父亲一直坚持反对这种做法，后来秀珍终于在十一岁的时候放了脚。第二年她嫁进山里时，她很庆幸自己有一对天足。不是这两个脚（注：没缠的脚）你敢说你咋（注：大脚走路方便）。象我这年龄人的脚象这大儿，这大儿（用手示意约有三寸），就这么大儿，我是大脚，人说脚大没人要，婆家见不得，那我这就到婆家屋里去我婆家大也没嫌过我，我老汉也没嫌过我，我就这净脚（注：没穿鞋袜），净脚就在那地里做活，山里跑，在北山上一天吆牛，担柴，到山里割柴、担柴，

³¹ 潼关县受到干旱的重创，许多农民都逃走了。到 1933 年中，一个经过潼关的旅人发现，大部分农民都回来了（顾执中、陆诒 1937 年）。1938 年，由于日军侵略邻省山西引起人口流动，潼关县的人口扩增到了 60,877 人，比民国元年增长了近 57%（《潼关卷》1997 年：第 37 页）。

³² 《潼关卷》1997 年：第 15 页。

³³ 秀珍给出的日期非常具体，但她在阴历和农历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并未说明她用的是哪个。她说她是第一个月的 29 日到达潼关的，轰炸发生于第二个月的第一天。当地方志说轰炸的日期是 2 月 28 日。

³⁴ 《潼关卷》1997 年：第 15-16 页。有关这些战役的更多细节，见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 年：第 18 页；郭润宇 1992 年：第 266-67 页。

³⁵ 1949 年以前，潼关县人口密度最大的年份是 1938 年，每平方公里 136.8 人。潼关因地处关隘，从陕西和山西进入山西都要经过此地，据一份地方志载，潼关的人口流动极为频繁，尤其是历史上每临战事，守关将士、流亡难民、政界要员、商贾等多在此处入口和出关（《潼关卷》1997 年：第 53、54 页）。其他我们访谈了大量妇女的县——渭南、南郑、丹凤、合阳——没有直接受到日本人的袭击。

那天日我曳犁、曳耙、曳耨，还曳轱轴碾场（注：用于放农作物的场地），把这儿（注：肩膀处）用根绳绊住，把这儿都勒的红红的，勒的乌青（注：紫色）。

生在 20 世纪头 20 年的女人，小脚仍旧被看成是优越出身的标志和未来理想儿媳妇的一个特征。脚裹得很早很紧——有个妇女称之为“真缠脚”——是有钱人家的专利。后来的劳模曹竹香解释道，唉，真正的把脚缠小的哪能也都是有钱家，讲哪小脚小金莲么。咱这一段农村家里没人的，也缠脚呢，可不是那么碎，财东家讲究小脚，做的哪花鞋在茶碗里放呢。”³⁶ 这些有钱人家的女人们都幽居深闺。

如果穷人家的女孩也裹脚，她们裹脚时的年纪要比有钱人家女儿裹脚时的大。贫困和家庭灾难常常战胜了社会习俗。后来也成为劳模、出生于 1908 年³⁷的张秋香就从来没有裹过脚。她说，后此没有妈了，没人管。³⁸ 陕西省南边的冯素梅的母亲跟张秋香差不多同时出生，但屋里穷的很，都没钱给她买裹脚布。³⁹ 曹竹香 1918 年生于渭南，从来没有裹过脚：要缠脚都是四、五岁的时候就给你缠了，说要缠，后来那大人娃多了，也就没给缠，可是一一直都穿那布袜子，夹袜子，把脚夹住，不准你黑了脱，给你不缠，叫你脚再不要长，不让你黑了脱袜子。

即使是年轻女孩子，对缠足这件事也态度复杂。一个生于 1912 年的女人说，她每天白天裹脚，晚上就在被子里偷偷地放脚，最后因为这种做法被打。还有一个晚二十年出生的女人回忆说，在她母亲认为裹脚很痛苦让人无法走路，因此拒绝帮她裹脚后，她曾试图偷偷自己裹脚。⁴⁰ 到了 20 年代，像秀珍家这样的基督教家庭停止了缠足。然而尽管父亲们愿意摒弃缠足这种做法，很多母亲因为担心自己的女儿将来嫁不出去，依然坚持要女儿缠足。⁴¹

20 年代，地方政府的反对缠足运动，对进行缠足的穷苦家庭予以处罚。秀珍走在时代的前沿：她在 1925 年左右就放了脚，而四年后礼泉县才设立天足

³⁶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³⁷ 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 1993 年：第 511 页记载张秋香的出生年份为 1908 年，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617 页记载的是 1903 年。1956 年她成为植棉冠军时关于她的一份材料说她当时 47 岁，那么她出生的时间应为 1909 或 1910 年（妇联 178-161-074）。

³⁸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

³⁹ 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 年。

⁴⁰ 与冯娜（2001 年）、李小梅（1997 年）的访谈。这份来自四个主要地区的叙述可能不能体现所有的地方差异。一份前妇联干部报告说，位处西安西的兴平县，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都缠足，报告还说，50 年代初土改运动期间，发起了一场大型运动劝说人们给他们的儿女放足（1996 年与刘招凤的访谈）。

⁴¹ 与张自珍的访谈，1999 年。有关晚清时期陕西缠足的普遍性及其对婚姻的必要性，见尼可尔斯 1902 年：第 134-35 页。有关缠足作为一种习俗和表征，见高彦颐 2005 年。

会禁止缠足。⁴²曹竹香娘家的村庄靠近县城，她回忆道，县上那县长他成天来检查哩，他后面那些人背个杆杆子，挑的那裹脚啦，挑的那尖尖鞋宣传哩，男的剪帽根了，不让给娃缠脚。过去男的都有辫子，叫人家见了，给你剪成短帽根子。女子再叫人家见缠脚，把你挡住，给你把裹脚一拆，把那挑上就拿上走了，村里人再见那来了，就都跑了，大人就不让你出去。⁴³关中和陕南地区 20 年代或之前出生的妇女通常都是裹过脚的，但是在那之后出生的则没有。⁴⁴

缠足可能会妨碍、但却从来不会阻碍田间劳动。缠足的废止绝对让参加劳动更容易。农忙季节，穷人家的女人通常都要去地里劳动，就像 T 村的一句俗谚说的那样：“麦典糜黄，秀女下床”⁴⁵（女人坐在炕上织布和刺绣；此处“下床”的意思是到地里去）。

关中是典型的旱地种植地区，秋天播种冬麦，到来年初夏收割，秋天收获大豆、玉米和棉花。很多农民也在秋天种鸦片。⁴⁶犁地、耙地和耨地一般由男人们来做，他们也负责播种。⁴⁷姑娘们和妇女们给麦苗锄草，夏收的时候割麦捆麦。⁴⁸关中地区的秋收季节，女人也给牛套挽具，割玉米，拣豆子，用小

⁴² 礼泉县地方志 1999 年：第 28 页。有关天足会此前在渭南地区的活动，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270 页。

⁴³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⁴⁴ 与宋玉芬（1997 年）、冯素梅（1997 年）、刘凤琴（1996 年）、乔引娣（2001 年）、周桂珍（1996 年）的访谈。

⁴⁵ 与王兆如的访谈，2004 年。

⁴⁶ 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 年。据卡普兰墨里（[Kaplan Murray] 1985 年：第 234 页）描述，十八世纪也是这种耕作形式，不过不种鸦片。她说十九世纪末，玉米成了一项主要的粮食作物，随之兴起的还有棉花种植（第 296-311 页）。卜凯（[Buck] 1964 年 [1937 年]：第 58 页）在民国时期的调查指出，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玉米主要时春季作物，但一些地方夏季也播种玉米。弗美尔（1988 年：第 256 页）说，从 50 年代初期，玉米的产量增长十分迅速。弗美尔 1988 年：第 222-89、324-82 页讨论了从 3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土壤、肥料、耕畜、种子品种和耕作形式。英国副领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 1921 年：第 84 页）将渭河平原描述为“关中地区最大的植棉区域”。棉花是主要作物，并在 1910 年代末出口到日本。19 世纪末，有些土地也用于商业生产鸦片，这是一项秋季种植农历三月份收获的作物（卡普兰墨里 1985 年：第 73-74 页）。1920 年，台克满（1921 年：第 vi 页）写道，鸦片曾在 1916 至 1917 年间短暂地遭到禁止，但到了 1920 年，又恢复种植并被当地官员课税。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渭河流域广泛种植鸦片。卜凯发现，渭南的鸦片占了种植区的 7.7%，64% 的农田种植了鸦片（卜凯 1982 年：第 178、184 页，引自卡普兰墨里 1985 年：第 79 页）。国民政府在日本入侵后曾试图禁烟，将农田转为种玉米和棉花（沈宗瀚 1977 年：172-73 页）。

⁴⁷ 做这些农活所使用的农具数千年来未曾改变：牛拉犁，剩下的工作则由人来完成（礼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 年：第 293 页；1996 年与曹竹香的访谈）。

⁴⁸ 与周桂珍（1996 年）、张秋香（1996 年）、乔引娣（2001 年）、张朝凤（2001 年）的访谈。晚清一位经过陕西的旅行者说道，“打理棉花作物是女人的专职。她们采摘棉花，将之纺成线，织成布并染上颜色，为全家做衣裳。”（尼可尔斯 1902 年：第 129 页）。

轮车把庄稼推回家，分清良莠。⁴⁹ 收割完成后，村里的男人会到东边更远的村庄里去当临时的麦客，很可能留下女人们去负责收获玉米和小米。

G 村更北的地方，更穷的人家在附近的大坝两边的底下都种上庄稼，家里的女孩和男孩一起帮忙开垦荒地。⁵⁰ 他们从深井里抽出极少的水以供日用，还要提水浇灌峡谷里的土地，一次提一桶水。回来的时候从则谷底拖柴火出来。一个由守寡的母亲带大的男人回忆：我妈拿着镢头就到老灵（地）里 pan（砍）刺，过去的妇女扛着锄都不放在肩上，灵里砍的刺都从地里就是拉着柴回来。绞水，我 zha（这里）的占原来的水 48 丈，我妈就掣到井上担那一绞放在台上，门和有好人过去就会给担，一吃水就是靠那，烧火就是靠这。⁵¹

水稻是陕南的主要作物，一年两熟，女孩和女人们通常帮忙插秧和给秧田除草。⁵² 在陕西南部冯素梅家所在的村庄，有俗谚说：“有女莫给贾家坝，罐罐把水余坷垃。”素梅的母亲从井里打水去浇稻田，一次提一桶。等到素梅和弟弟可以自己提得动小桶的时候，他们也跟母亲一起打水。⁵³ 陕南的姑娘们也背着篮子上山割草喂牲畜，拾煮饭的柴火，找野菜以补贴家里粮食的不足。⁵⁴ 关中和陕南很多家庭都种植少量的棉花，女孩和妇女们的工作是把棉铃摘下来带回家中，摊放在院子里晒干，晚上则把原棉挑拣出来。⁵⁵ 在有些家庭，棉田间苗、锄梦花、给棉花打顶等工作全部都由女人来做。⁵⁶

1949 年前数十年，男人离家去别处做长工是很多家庭使用的策略。⁵⁷ 这些家庭能够获得男人寄回来的一些收入，但是田里的工作就留给了更年长的男人、妇女和孩子。士兵和寡妇家庭也是如此——不过外面并没有钱汇回家里。30、40 年代的陕西，女孩和妇女不仅只是在收获时节到田里劳动以弥补男劳力的不足。考虑到男人普遍都不在家，农事就成了女人的工作。

曹竹香的夫家没有成年男子，家里的农活一开始是靠她兄弟和侄子帮忙。⁵⁸ 马丽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守寡，让哥哥种她家的地并给他一半的收成。⁵⁹ 然而，女孩和妇女们会经常加入进来替代男人的角色。G 村的童养媳刘

⁴⁹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刘凤琴的访谈 1996 年。

⁵⁰ 与雷彩娃的访谈，2001 年。

⁵¹ 与杨贵石的访谈，2004 年。据贺大卫（[Holm] 2003 年：第 866 页）描述，合阳县的妇女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取水。他写道，“这项费时的工作产生了一种非正式的妇女关系网络、一种井边的姐妹会，这成了合阳乡村生活的一个特色”。

⁵² 与钱桃花（1997 年）、冯素梅（1997 年）、李六斤（1997 年）的访谈。

⁵³ 与冯素梅的访谈，1997 年。

⁵⁴ 与钱桃花（1997 年）、王友娜（1997 年）、李秀兰（1997 年）、张秀丽（1997 年）、鲁玉莲（1999 年）的访谈。

⁵⁵ 与周桂珍（1996 年）、刘真西（2006 年）、钱桃花（1997 年）、张朝凤（2001 年）的访谈。

⁵⁶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⁵⁷ 与刘真西的访谈，2006 年。王西芹（1996 年访谈）的丈夫来自 B 村，十四岁时便开始在渭南一家小店做工。李秀兰（1997 年访谈）的父亲住在 T 村，30 年代离家到外面去做木匠。冯娜（2001 年访谈）未来的丈夫住在 G 村，也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外出做过长工。本章有很多童养媳们进夫家门时未婚夫都不在家的故事。

⁵⁸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⁵⁹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

谷雨，丈夫去当兵了，她便跟着公公一起播种、犁田、施肥、帮忙用铡草机给骡子准备草料。她的婆婆恼火她没有做女孩儿该做的家务活，会经常吼她：“我娘一天把我嚷的说叫你一天 fe（纺）花，你一天懒的光给你大 po 草（割草）。”谷雨要在天黑以后纺线，但她很快就对此感到厌倦。她宁愿到外面的地里去，⁶⁰干一些未婚夫在家会干的活。

像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一样，关中和陕南农村未出嫁的姑娘们是不应该出家门的。然而，尽管穷人家出身的姑娘在她们的故事中不断强调深居闺阁是定式，她们回忆中的具体内容却老是提供了另一番景象。生于 1918 年的曹竹香回忆道，她年轻的时候，女孩只有到了黄昏才准许出门，有时她们会一堆堆地扎在一起讨论她们的嫁妆。她记得自己五岁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的院子里度过，被教着如何纺织。她也讲述了帮哥哥推运粮车（他将面粉运到县城和其他地方），并从哥哥的空袋子里刮下面粉细末，和着她从地里摘来的野菜一起煮给家人吃的故事。她记得自己一直到十一二岁还去地里挖土，随后就待在家里。但她也说自己在十四岁时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正在田里收鸦片。⁶¹ 社会要求未婚女子待在家里的规定是如此严格，妇女们记忆起来都是有关自己被关在家里的事。但是她们故事的具体细节却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已婚妇女也被认为只能外出去探访娘家。就算是她想在正月元宵的时候从门口观看村里的喜庆活动，她也要穿上妇女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应该穿的长裙来遮住其他衣服。⁶² 然而，这种社会规范如缠足一样，在人们的想像中占据的地位比真正在穷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的作用要更大。对那些丈夫外出工作或应征兵的妇女而言，“内”“外”活动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跟传统的“男耕女织”说法里描述的明确劳动分工有很大出入。

例如，山秀珍在逃荒一结束就开始农事耕作。靠我种着哩，靠谁种着哩，抗日战争抬伤兵，挖战壕男的不在家嘛。她种了小麦、一小块地的棉花和一些西瓜来卖了换现钱。她和母亲秋天种玉米、小米、大豆。但仅靠种地并不足以维持开支。潼关县县志报道说秀珍独自耕种的那四年一直遭受旱灾，虽然没有一场干旱像那场让她远走秦岭的大旱那么严重。⁶³ 每年秀珍种的粮食里最好的三十斗都送去了给地主交租。据她回忆，每个月还要交一定数量的小麦。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去借，但借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吃一斗包谷给还一斗麦，一斗麦给还二斗包谷嘛。

还有一种认识增加了像秀珍这样的妇女的压力，那就是，认为妇女到地里劳作会遭到欺负和羞辱。鲁玉莲的母亲，陕南一个二十七岁的裹脚寡妇，试图要种家里租来的四亩（三分之二公顷）水稻田。尽管玉莲的母亲能够承担耕

⁶⁰ 与刘谷雨的访谈，2001年。

⁶¹ 1902年，一位去陕西的旅人指出，“但如果陕西没有酒鬼，那么鸦片烟鬼便填补了这个空白。这块土地上饱受鸦片祸害的人们要么在路边乞讨，要么在睡在屋檐下，要么懒散地游荡在茶馆里的长凳上。总能从满脸菜色和褴褛的衣衫上将他们辨认出来。”（尼可尔斯 1902年：第 132 页）。据弗美尔（1988年：第 4 页）说，长期以来的禁烟运动一直到 1939-40 年才成功，当时日本人的入侵迫使很多国民党官员迁到中国西部地区。更多细节，见第 325-29 页。

⁶² 与刘真西（2006年）、何改珍（1999年）的访谈。

⁶³ 据潼关方志报道，1942年夏旱，1944年春、夏大旱，1947年大旱且全年的收成都低于正常水平，1948年夏旱（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第 89 页）。

种的工作，她却无法抵挡当地政府的提出的钱粮要求。我记得我总是七八岁时，那要粮要款我妈真啥给得。人家还把我妈绑到一棵树前，要款你莫得么。我那姑父，乡上的乡长是自己人。这我连哥两个都是小人，莫办法。就去求人家那姑父，叫把我妈放回来。以后才把那地叫我姑父种下，我姑父一种，人家都不要粮不要款了。我种人家就颇命要[要得非常厉害]。像玉莲的母亲这样持有很强的女德观念，并坚持不改嫁的寡妇来说，这是一段极其丢脸的经历。由于把田租给男性亲戚种只能换来四成水稻的收成，她并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家里三口人。她和孩子们便将米磨成粉拿到山里去换玉米，靠着更便宜的粮食和野菜汤艰难度日。⁶⁴

秀珍说，咱也穷的很，干时羞羞答答的嘛。旧社会穷人的妇女也经常下地割麦担粪，啥活都能做，就是做时不朗然。就是羞羞答答。你咋不知道那可怜家里没人做，⁶⁵抗日战争时期，男的叫拉夫抬伤员不在屋，那地里活女人不做叫谁做呢嘛，你还要吃呢，国民党还要款呢，你不做咋办。

也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原因让女人害怕到地里工作：在那种不断被土匪和士兵侵扰的环境里，一个女人抛头露面是危险的。秀珍在潼关安顿下来数年后，一个同村的人对她丈夫说：“给我老汉说你看你媳妇子出去危险不危险（注：特别危险），我那个危险区通过渭南地区，那儿人都知道。到田地里去的女人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贫穷和脆弱。

织布

山秀珍到了八岁的时候，母亲为她架好了纺车。和许多其他年轻的姑娘们一样，她被要求白天纺棉，她母亲日夜不停的工作是楷模和激励。我娘对我十分严厉。我害怕她。她晚上做针线活。只有她不工作了你才可以不纺了。我为别人纺棉，不是为我自己。你也不能逃走。年轻姑娘们的母亲给她们分配了纺织量，一天要纺两到三个或五个穗子，每个穗子有半盎司到一盎司重的线。只有她们完成了任务，才能出去玩，虽然也有些人回忆说，一旦周围没人监督，她们就出去玩；一看到大人来了，她们又马上坐下来勤奋地纺线。⁶⁶她们也学会了弹棉花，为纺纱做准备。⁶⁷她们将纺棉记忆成是使母亲的生活和自己的童年“恹惶”的一部分原因：夜里工作，太穷而点不起油灯，就着香头的亮光给纱锭缠线。⁶⁸

⁶⁴ 与鲁玉莲的访谈，1999年。

⁶⁵ 秀珍用的“人”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人们”，但在关中方言里，“人”指“男人”。见本章结尾处的讨论。

⁶⁶ 与钱桃花（1997年）、王友娜（1997年）、冯娜（2001年）、周桂珍（2006年）、张朝凤（2001年）、冯素梅（1997年）、雷彩娃（2001年）的访谈。

⁶⁷ 与刘谷雨的访谈，2004年。

⁶⁸ 与杨安秀（1997年）、冯素梅（1997年）的访谈。

但纺棉的记忆里也充满着了社交的乐趣：到别人家去纺棉，将十几辆纺车聚到一个大房间里一起纺。⁶⁹

农村的女孩们经常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织布了。年长一点的亲戚或邻居会教她们在织布机上打结，然后让她们练习织布但却不会把线弄断。⁷⁰通常，关中和陕南的妇女一年要用家里纺的或买的线织几千尺的布。布织成长细条状。粗布织得更快，用来当手帕和制麻袋；一套衣裳需要七八尺细布。如果一个家庭负担得起，他们会把厚一点的布留给自己用，把松一点的卖给别人。⁷¹每到春节，妇女会给孩子们准备新衣，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尽量给大人们准备。每年人们都把棉袄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只洗夹衣，然后再把棉花塞回去。⁷²新布在家染色；里面的衣服染成浅色，外面的则染成深色。⁷³水稻种植区的妇女用树叶和田里的泥将布染成黑色。⁷⁴在没有水稻田泥的地方，女人们把石榴的叶子和皮用水煮后来生产黑色染料。⁷⁵

纺线、织布和针线活是代表女子技艺、勤劳和节俭的典型标识。妇女们记得自己刚开始是如何笨拙并受到斥责的。但是在别的极少数的没有经历过困苦、回忆起来的情感也不仅是“恹惶”和害怕的故事里，有关纺线的讲述也并不相同。妇女们回忆起如何为自己日益精进的技艺感到高兴，如何得到平时没有精力或无意赞美自己的母亲的赞许，以及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下展现出创造力。

我纺线都十来岁了，我妈笑着说我大鸭子上了架了。（与王西芹 2006，生于 1932 年）

织布好学。腰里带个盘腰带，脚踏里，手搬里，有花的，道道的，块块的，你看有人家织的啥好，就织啥。（张朝凤 2001，生于 1934 年）

我织布织的迟，先着我妈嫌我织那布不好，她做下的活比我做的好，她就不让我上她的机子，实质织布是在 20 多岁时织的。我跟上她看我也会做，会弄线、安机，我学的做比她还织的快，纺线也比她纺的快，她那线光，我那线毛绒绒的，慢，我拿那一浆，毛线就出去了，后来她见我我会做啦，她让我做哩。（山秀珍 1997，生于 1913 年）

战争期间丈夫不在家，山秀珍把租来土地的四分之一都种上了棉花，共收获了四十五斤（约五十磅）原棉。她弹棉、纺线、织布、然后将之卖掉。速度很重要，因为她需要用这笔收入去偿还她借的粮食。她两天就可以纺一斤（1.1 磅）线，一直工作到深夜。这相当于十斤米的收入。她四天就可以织十丈（109 英尺）布。织好的布都不会用来给家里人做衣裳；设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

⁶⁹ 与欧阳秀（2004 年）、周桂珍（2006 年）、雷彩娃（2001 年）的访谈。

⁷⁰ 与欧阳修（2004 年）、周桂珍（2006 年）、刘凤琴（2006 年）的访谈。

⁷¹ 与曹竹香 1996、2006 年的访谈；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 年。

⁷² 与周桂珍的访谈，2006 年。

⁷³ 同上。

⁷⁴ 与李六斤（1997 年）、冯素梅（1997 年）的访谈。

⁷⁵ 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 年。

关中和陕南地区农民身上穿的一针一线、衣服和鞋子（可能结婚用的红布除外）⁷⁶都是当地的姑娘和妇女们制作的，尽管有时候精通做某样东西的家庭也会拿着这样东西去别家交换其他东西。对一些丈夫已经去世、离家、或有残疾的妇女来说，她们生产的布匹和做的针线活计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⁷⁷曹竹香说，有地的有地，没地的还得靠两个手。⁷⁸杨贵石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亲应征加入了国民党并再也没有回来。他说自己十二三岁前从未见母亲睡过觉。就是我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就是靠过去织布，纺花，记得岁岁（很小的意思）黑了哄的教娃睡着，早上起可把娃叫起来，就没见过我妈睡觉，因为有时她们是黑了织布，就这个每天到会上把织的卖掉，赶集，我这到路井镇上，到会上一卖，卖的钱换成棉花可自己弹。巷里像我妈那里情况的人也不少。她们几个相跟上到路井一卖，换上些棉花。

就算是耕地有收入或者家里有男人从外面寄钱回来的人家，织布和针线活也很重要。妻子、女儿、儿媳都纺线，织布，做鞋子拿到市集上去卖。她们用这些收入去还债，交征兵税，买粮、油、盐、原棉、线（如果她们织布），布（如果她们纺纱）和其他一些杂货。⁷⁹有时候女人会揽邻居的织布活，对方提供线并付她工钱。⁸⁰如果男人在家，他们会把布拿到市镇上去。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人们带着织好的布离开家到村里或邻村去赶市集。⁸¹

一个妇女到达陕南的某个市集后，就会发现很多其他妇女也在卖东西和买东西。都是抱到怀里头，织了几匹布，抱到怀里头，纺线的呢，卖个捆捆——，两个穗子拐一个爬嘛，八爬线摠一摠是一斤。就是个一块几毛钱。钱也给，换棉花也换呢。换一斤半，地有一斤四两的。一斤棉花能纺一斤线。都是妇女来回交换。没有布贩子。卖给这些农民，（那）都是穷的（这）布啊。还是这些人买嘛，那庄乎又不兴把扯到外头去。有买布的嘛，有不会（织）的，买些布回来穿嘛。⁸²如果用1斤线换了1.5斤原棉，那么多出的半斤原棉代表了获得

⁷⁶ 与刘谷雨的访谈，2001年。

⁷⁷ 与张朝凤（2001年）、高贞贤（1997年）、王西芹（2006年）、李六斤（1997年）、王友娜（1997年）、冯娜（2001年）、于小莉（2001年）、王兆如（2004年）的访谈。2006年，刘真西凭着记忆将各户人家一一点了一遍，他估计，B村42户家庭中，最穷的12户的妇女产布卖。

⁷⁸ 与曹竹香的访谈，2006年。

⁷⁹ 与庄小霞（1996年）、山秀珍（1997年）、曹竹香（1996年）、杨安秀（1997年）、钱桃花（1997年）、刘冬梅（1999年）、乔引娣（2001年）、雷彩娃（2001年）、马丽（1999年）的访谈。

⁸⁰ 与钱桃花（1997年）、王友娜（1997年）、李秀兰（1997年）、李六斤（1997年）、马芳贤（1999年）的访谈。

⁸¹ 与张朝凤（2001年）、刘存雨（2001年）、刘真西（2006年）、庄小霞（1996年）、王西芹（2006年）、曹竹香（2006年）。

⁸²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有关市集上的妇女，亦见与李秀兰的访谈，1997年。

的利润。这半斤原棉可以直接卖掉、纺了再卖、或用来换食物。⁸³ 同样地，除去买原棉的花费外，一块布也能带来几分钱的利润。⁸⁴

妇女们也做草鞋、布鞋和刺绣品卖。⁸⁵ 20 世纪的 30、40 年代，后来成为全国劳模的张秋香当时才刚结婚不久，便到附近一个五天一开的市集去卖自己做的鞋子和买回做下一双鞋的材料。她一天一夜就能做一双鞋，每次赶集卖五双，三十到四十分钱一双。⁸⁶ 40 年代末，郑秀花和她的兄弟在当地市集卖手工制作草鞋。她也在那个时期学会了给枕头绣花和做门帘。这些绣枕和门帘被年轻的姑娘们买去当嫁妆。那我扎花扎的好，这街道还没有比我扎花扎的好的。有人拿那不好的枕头四块或三块半，我的卖五块。秀花把钱交给母亲去买粮食。由于秀花父亲跟张奎的共产党游击队去打仗了，母亲则靠孩子们做针线活和自己从纺线、织布、搬柴和洗衣服挣的钱来养家。⁸⁷ 对穷人家的姑娘和妇女来说，在公共场所售卖纺织品和鞋子是常见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那些认为女子幽居深闺才是常态的讲述者们也实事求是地详述了这种情形。寻找食物、农耕、纺织、缝纫和刺绣——女人们在壮年男子不在家的年月里七拼八凑地维持着生计。

失去

妇女们 1949 年之前的生命故事中总穿插着饥饿、重病、被迫的分离和死亡。她们把这些事件说成是个人的灾祸，但也常常将这些事件跟显著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1928 年的大旱灾、1932 年的霍乱大流行、1942 年河南的饥荒、全国打击盗匪运动、国民党的征兵政策。这些大规模的事件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但对女孩和青年妇女的影响尤甚。这些女孩和青年妇女要么被送到别处去当住家劳工、童养媳、新娘，要么由于丈夫不在家或去世而成了家里的主人。她们中很多人的孩子都得新生儿破伤风、麻疹或痢疾死了。这些女人还是幸运的。那些死于饥荒或生孩子的妇女，丈夫失踪或死后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妇女，或被卖到青楼的妇女则没有留下任何故事。

在戏剧性饥荒的间歇中，平时饥饿的记忆也遍布在关于 1949 年之前生活的故事里。很多关中的农民种麦子，但只有家庭条件好些的才会自己吃。馒头和稀粥就着干辣椒和野菜叶，如果有油就搁上一点儿油。⁸⁸ 在陕南种植水稻的地区，妇女们谈到过去吃卖不出去的碎米粒的事情。这种碎米粒现在都用来喂

⁸³ 与杨安秀的访谈，1997 年。

⁸⁴ 各个地区的市集都不一样。T 村一般都是当地人去赶市集，妇女也不会拿她们织好的布到附近的山区去卖。关中的 B 村有从外面来的布商，和当地人一起买当地妇女织的粗布或细布。Z 村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亲戚则通常一起拿布到山区去换粮食（与李六斤 [1997 年] 的、曹竹香 [2006 年]、马丽 [1999 年] 的访谈。）

⁸⁵ 与马丽的访谈，1999 年。

⁸⁶ 与张秋香的访谈，1996 年。

⁸⁷ 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 年。

⁸⁸ 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 年。

鸡和猪。⁸⁹ 像张朝凤这样从小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掉当童养媳的妇女，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认为新家有足够的吃的。⁹⁰

那场把山秀珍送进山里的旱灾还没有完全消退，霍乱又席卷了关中地区。从1932年的6月到8月，渭南县有逾五万人死亡，“村户萧条，尸骨遍地。”⁹¹ 曹竹香的父亲、三姐、姐夫也未幸免于难。那瘟疫么，把那病都叫“呼里拉”么，那死的人多的很，那热天人都不做啥，伴（正）说着闲话呢，那就把命要了。有头没脑的，回去也不知道就把命要了，睡一晚上你都不知道这一个村子出事的有多少呢，死男、女的、老的、少的，有的那一来，全家子，就我这个村子，多少家现在都没人了，没了现在这么大个村子，南北二村就剩下四十来家了。

1941年⁹²，陕西的南郑县，一场过早的干旱让完全依赖降雨的当地农民无法把秧苗种到田里。李六斤的母亲已经到一百里外（约三十英里）的山里去了，靠做针线活换来的玉米来养活六斤和她患病的父亲。这种建立在母亲离家工作基础之上的权宜之计，显然不足以养活父亲和女儿。几个月后，六斤被送给另一户人家当“押身女”，以确保那户人家接下来生的孩子都可以存活下来。她过的其实是童工过的日子。我那时才十一岁。推磨，在磨坊里。一天给了个牲口，红马马。推大斗是四斗麦子的面，三十斤一斗嘛，推三四一百二十斤面，从早到晚一天钻到磨道里给人家咣当咣当搬罗柜，以后除以吃饭了把牲口喂一下，连头都顾不得梳。下午磨推毕了，又到南龙寺海子坝去给割草，是在谷桩（茬）田里割那个爬（长）起来的青草，割回来喂牲口。晚上来呢，还给你些棉花坐到那线，喔毛盖子（头发）直接髹（jiu）的是——，协税个前街，后街，从喔走，人家说，哎哟这个女子的脑壳呀锈的喔哟，就象个锈头呀是的，喔擻了粘了就是喔，塞成疙瘩，一下拉车到援下来一坨坨虱子是乱爬，就是喔，头都顾不得梳！黑了还得坐那纺一个穗子线才得睡瞌睡。早晨扒起来又是推磨。我记那有一天叫给做饭呢，那么把饭煮的包了浆了，没煮熟哎呀我按到美呀打了一顿。幸好半年后，六斤的母亲从山里回来了，把女儿赎回了家。⁹³

第二年，邻省河南爆发旱灾。残酷的政府持续压榨，使旱灾很快演变成了饥荒。购买一个河南女人的价格降到了以往平常水平的十分之一，十多万名

⁸⁹ 与杨安秀（1997年）、鲁玉莲（1999年）的访谈。

⁹⁰ 与张朝凤的访谈，2001年。

⁹¹ 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第17页。合阳县有2,129人死于霍乱病（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第13页）。据报道丹凤县也有霍乱（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第20页）。

⁹² 南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第141页。

⁹³ 与李六斤的访谈，1997年。

难民逃往陕西。⁹⁴ 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女儿启程出发，女儿们分别是十五岁、十二岁和十岁，姐妹仨轮流到一辆三轮车上坐。他们在河南一直吃煮麦草，身子都是肿的。家里人决定，让姐妹三个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是将她们送往陕西合阳县嫁掉。她们的一个姑姑在合阳有亲戚。当一个地区爆发灾难的时候，通常都是社区里的女人提供救命的联系，因为她们是从别处嫁进来的，因而在其他地方有亲戚。

父女几个到达河南洛阳的时候，天正下着雪。他们蜷缩着挤在一床被子底下痛苦地挨了几天之后，扔掉了三轮车，踏上了去合阳的火车，然后步行到了离 G 村不远的雷家庄。在亲戚的帮助下，父亲在陕西一直待到帮女儿们找到婆家。他没来得及见女婿们就回河南去了。大女儿卖给了一户儿子在外面做木匠的人家。老二谷雨去的那户人家儿子当兵去了。最小的女儿存雨卖给了一个儿子是个弱智的家庭。直到确定女孩们的父亲已经走后，这家人才让这个弱智儿露面。⁹⁵

谷雨在新家住了五年后才正式成亲。我婆婆给做了一套新衣裳。她怕我饿慌了，一下吃太多伤了。她不让我吃多，每天就给两片干馍。新家需要谷雨来劳动；她的婆婆是个鸦片烟鬼，无法一日三餐做饭，谷雨未来的公公便教她做面条和磨面粉。给我教会后，我大再没做饭，再没进灶房。

谷雨是幸运的。公婆待她很好。到新家四年后，她未来的丈夫才回到家里，但他头一次说话就暖了她的心窝。他说，“看 nan 你是从河南来，他大穷的送不起媳妇，我 ya（也）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咱 zhen ya 就成了一家人哩”。他们成亲的同时，新郎的哥哥也和一个童养媳成了亲。⁹⁶

比谷雨小两岁的妹妹存雨便没有这么好运。把我送到这 zha 咧，我大回去咧，回去咧把我就扔到这（zha）咧，啥）都没说，就是说有一碗饭吃，没给说要卖给人家，我大回去咧，我瞧着一人老不中看，就说这就是女婿，rong 不行，人不行，比我大十来岁。也生下有点不灵醒。她丈夫智力上的障碍将会在集体化及以后的时期影响她的生计。⁹⁷

由于婚姻上的问题和物质上的困难而导致的精神病让很多家庭饱受折磨。B 村的周桂珍说，一连串的不幸逼得她父亲去自杀：第一个老婆死了，第二个老婆总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三头牛被偷了，作为周成亲聘礼的粮食差点被偷

⁹⁴ 谢伟思 (Service) 1974 年：第 17、11 页。此处给出的一个女人的“正常”价格为 3,000 元。

⁹⁵ 彩礼跟女孩的年龄有关。谷雨不清楚她父亲获得了多少麦子，但她认为自己的彩礼是 4,000 元。她姐姐的彩礼是 7,000 元，十岁妹妹的则少得多（与刘谷雨的访谈，2001 年）。

⁹⁶ 谷雨很喜欢这个新娘子，但她无法开口叫她“嫂子”，因为她比自己小三岁。两人相处很融洽，一起分担家务活。从 1949 年到 1968 年，谷雨生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大的孩子三岁时，因抽搐痉挛吃了牛黄而失了聪，但所有的孩子都活到了成年（2001、2004 年与刘谷雨的访谈）。

⁹⁷ 与刘存雨的访谈，2001 年。在陕西方言里，“卖给人家”的意思是嫁给某人，而不是售卖给某人。

了。有人要偷那粮哩，就把我父亲吓的得了神经病，看了一年多，看不好了，我就跑到我舅家去了，回来，我父亲跳河了，可没死，到过了年，我出去要去了，我父亲上吊了，屋里就剩和姊妹三个了，天天晚上，我没回去，我俩个弟弟牺惶做到门口不也门，到晚上，三个人不敢睡觉，一黑一黑都在炕上坐哩，确实在旧社会我让别人欺负扎了，所以到这以后，我老给人宣传哩，旧社会把妇女欺负的牺惶太太。⁹⁸周秀珍天衣无缝地把一连串的伤害和不幸——情绪不稳定、反复被盗、有权阶级的欺凌——跟她的故事里没有直接描述的东西联系到了一起：女人经受的特殊的苦难。通过制造这个联系，她利用农村妇女在诉苦年代学到的政治类别，为她的过去赋予意义。

死于生孩子或坐月子的情况很普遍。周桂珍十岁的时候，母亲死于产褥热。还有一个娃，知道自己好不了，在床上拿被子，把娃捂死了。从30年代末一直到1946年，周秀珍几乎年年都怀孕。她流过一次产，生了五个孩子。她是在怀孕三四个月的时候流产的，当时正是夏天，农忙刚过，她像往常一样在田里干着重活。我那个时候得知咋有劲的很，我说这娃得知是二敢子吗咋（注：是否是傻子），那五斗麦一布袋，我肩上（注：抗上）就走了，你看就是有劲（笑），就生下这能出力这人嘛，那小月不是肩是抱（注：因抱东西而小月）。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秀珍就用篮子把孩子提到地里去。把娃放到地里，放到我眼前，我在这儿娃就在面前，后面害怕有野虫虫子，没了，把娃背到脊背上，背在脊背在地里掰包谷，包伙叶叶把娃脸都刺的稀烂。她的孩子都活过了婴幼儿时期，接着便一个个死于麻疹。在30、40年代的陕西，麻疹对大人和小孩都是严重的威胁。⁹⁹1944年，麻疹也席卷了G村，当时乔引娣十二岁。在她卧病在床的七天里，她母亲为她准备好了寿衣。她记得那个星期是模模糊糊的一团：昏睡、脓包、结痂、和麻子。那年村里得麻疹的大人都死了。¹⁰⁰

⁹⁸ 与周桂珍的访谈，1996年。

⁹⁹ 秀珍三十二岁以后便再未有过身孕：也没计划也没生。不要啦，生下娃不得活。

然而，她在喂最后一个孩子的母乳干涸之前，收养了一个刚死了母亲的两个月大的男婴。这个儿子挺过了小时候的麻疹并活了下来，对我们当时采访的八十岁的秀珍很是关心和体贴。抱的吃我的奶长大的，我那时候有奶哩，饱奶。这个娃是可乖啦，可好啦，见（注：对待）我好的很。这里里外外的，里孙子外孙子两个男娃两个女娃，那他都没呛过我，听话的很，儿子到媳妇到孙子都没呛过。（1997年与山秀珍的访谈）。

¹⁰⁰ 另一个对年幼孩子的威胁是腹泻，并且可能来的毫无征兆。乔引娣在40年代失去了几个尚在蹒跚学步的弟弟和妹妹。她将之归因于吃了太多的西瓜，但不论是何原因，G村医疗服务的缺乏使得任何一种腹泻都可能致命（2001年访谈）。弗美尔征引的一份1949年的调查表明，在关中地区，1939年至1948年出生的所有儿童中有三分之一死亡，最常见的死因是破伤风、麻疹、肺炎、痢疾和白喉。

征兵和男人的缺席

整个 30 和 40 年代，穷人家庭的男人都去打仗了。到了 1939 年，整个陕西省就有 200,000 人被征去当兵，每个县都分配了应征配额。¹⁰¹ 理论上讲，国民党的征兵政策适用于所有男子，然而富豪子弟往往可以通过出钱买丁而“免征”。G 村所在的合阳县，由于靠近黄河对岸山西的战争可能发生地，是壮丁买价最高的县之一。¹⁰² 征兵通过当地的保甲制度来实行，¹⁰³ 保甲制度出于防卫和征税的目的，将社区划分成单位。有权势的家庭则居保甲单位之首，征兵模式反映了农村的金钱和权力关系。¹⁰⁴ 住在 B 村曹竹香家对面的地主就没有被征入伍；他的父亲负责征兵。¹⁰⁵

女儿通常是一个家庭中能够让父亲或儿子不被征兵的唯一办法。大约 1944 年，王西芹嫁到 B 村当童养媳，家里便能用彩礼把她父亲从军队赎出来。¹⁰⁶ 不知是 1945 年还是 1946 年，B 村的一个富农出钱让刘凤琴的丈夫顶替自己。她家从来没见过钱。到底是那个富农没有付钱还是她公公把钱赌光了，风琴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像其他很多女人一样，要在丈夫不在的时候

¹⁰¹ 1937 年南京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规定 18 至 25 岁的男性国民须服役 3 年，26 至 45 岁服国民兵役。出台的规定要求以抽签的形式决定应征者、“独子不征”、“无论贫富贵贱，均应应征”。然而，滥用、违反法规的现象广泛存在。抗战期间，商县（即后来丹凤县，Z 村所在地）的征兵名额增至一次 5,000 余人，甚至一年数征。“军队、保甲持枪强拉，一些青壮年为了躲丁，往往背井离乡。”抗战胜利，停止征兵。然而 1946 年内战爆发，又恢复征兵。（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4 年：第 475 页）。G 村所在的合阳县，1939 年配赋 1,428 名，次年增至 1,848 名。到了 1942 年，全县壮丁已无签可抽，而配赋却增至 3,900 名，致使买兵“免役”的价钱飙升，而各级官员纷纷将收到的买丁钱纳入私囊（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574 页）。弗美尔（1998 年：第 409-10 页），给出了陕西省征兵的总数额为 200,000 名并对合阳县买丁的高价格作了评论。他写道，“买丁的现象非常普遍，买兵价格也飞涨。”1940 年，渭南地区征兵数达 7,049 名，从 1937 年到 1948 年，总征兵数达 34,321 名。有关 1937 年至 1948 年间渭南县每年配丁数和实际征交数的情况，参见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503 页。有关南郑县的征兵情况（T 村所在地），见南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 年：第 474 页。对全国范围内的征兵规定及伴随的腐败和滥用法规现象的进一步讨论，参看方德万（2003 年：第 145-46、253-58 页。）

¹⁰² 《西北农报》第 1 卷，第 3 期（1946 年）：第 110-15 页，引自弗美尔 1988 年：第 410 页、519 页注 80。这篇报道称关中的买丁价格在 200 至 1000 元之间。一个壮丁家庭如果要一个来自更穷家庭的壮丁去顶替他的话，大概要出这么多钱。

¹⁰³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南京政府重新推行和沿用了帝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所有家庭都要进行登记，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甲制度中年龄 18 至 40 岁的男子需被训练成地方民兵，以“协助地方上的救灾、修路、防盗匪和修筑碉堡和栅栏的工作”（方德万 2003 年：第 44 页）。有关 1933 年陕西对保甲制度的恢复及其在战争时期的扩大，以及各县保和甲的具体人数的图表，见陕西省民政厅 1940 年。有关渭南县与合阳县的保甲数据，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19-21 页。

¹⁰⁴ 有关国民党征兵和征兵滥用的情况，见葛瑞峰（Ruf）1998 年：第 24-28 页。有关渭南县富户雇人顶替，权贵强拉强卖和军队乱抓行人、抓麦客、抓贫困户的情况，见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503 页。

¹⁰⁵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¹⁰⁶ 与王西芹的访谈，1996 年。

靠纺织来养活自己。¹⁰⁷ 在鲁桂兰家，我那拉壮丁先在我家拉。我家没钱也没势。国民党拉壮丁，本来是人家村子保长的弟弟，但是人家拿我兄弟，婆婆把我兄弟拉着去，就把我婆婆一下掀到案上，案棱棱把老婆的肋骨都垫坏了。临死时我婆婆就地一簸箕能端起。¹⁰⁸

20 世纪 30 年代，后来成为地方领导和劳模的曹竹香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抓去当兵了。她指责这件事是造成丈夫后来患病和死亡的原因。那一段他小，在地里干活哩，过来了个保甲子，从脊背后头把人一下子都踩住。来了把人拉走了。拉兵。就是那样，心里受了惊天动地，拉出去。拉到渭南。去的那邻家的人，一看拉上去了，才悄悄回来给我透风来了，给我说了。以后都我妈又找我那老亲戚，人家那儿子在那叫兵啥处。可放到电话局里，我那二姐夫在电话局里，那时叫管理叫吆，当那通讯。那人，受过惊，一受惊，一两年病就贴到身上，在那再弄不成了，也跑不了，以后把他送回来。

咱又没钱，寻钱，贷钱给他看的，那一样一样的病，那后次，就在这几连胸口这儿，有一个疙瘩，比这奶都大，把衣服撑的多高，人身上一下都黄完了，我也不知道啥病，说胜子是个饥，叫个癌症。不知道叫啥癌，看不好，在那个情况，那实在都没办法了。

我出去跑到县上给那一天还要抓药，还要卖的吃，我哥给我些钱，我哥也不敢跑，那人家拉嘞吆，那就咱这妇女那一天出去。穿那一天在县市里给他抓药，警报一响，抓药的老汉就说：哎呀，这个娃，赶快走，我镇门呀，就那出去以后，着是在那县南门外头，北门外头，全占到人家那南门外头，北门外头那泡豆芽的深坑里头避了。

国民党轰炸哩，日本轰炸早一点。那是几年，我弄不清，我掌柜就是那年死的。就是那样轰炸哩，把那炸干了，哎呀，从那跑出来，在那都钻地避了几回，屋里哭，咱在那吓的哭，不知道屋是咋样，屋里就咱这农村，那飞机飞来，把天都罩黑了，牺惶守到那碑子坟里，那些年，那财东都有那大碑子坟，生密，那树生严，给那里头藏，人牺惶的上到那柏树上头，它就是扔下来打不住人，就那一天逃的过那个，那时人实在都想不到能活到今天。头几回，他要吃血辩（译注：羊血），给跑到县上卖了一回辩，还避了一回警报，把血辩拿

¹⁰⁷ 与刘凤琴的访谈，1996 年。1947 年，公开买卖壮丁，一兵需小麦千余斤（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503 页）。

¹⁰⁸ 与鲁桂兰的访谈，1996 年。

回来，那就是连话都说不了了。屋里我妈坐到门上哭，抱的娃，我二妈哭，¹⁰⁹就那病就不行了。我把那在锅底烧，子没有炉子，又没有啥，给那弄了两片血辨。人一见咱回来了，心放下了，在火里烧，弄了两片，吃了半片，再没说过话，头到下午就闭皮了，这就是最后那一回，后来病是扩散了，他总是的吐血，尿的是血，过去都不懂，也没经过大医生看过，这当时咋办哩？

作为历史记录，这个故事是令人费解的。国民党是在 1936 年 12 月 13 日的西安事变期间轰炸了渭南火车站，日本军队则分别在 1938 年 10 月和 1939 年 10 月轰炸了渭南县城——日军的轰炸是在国民党之后，而不是像竹香记忆的那样在国民党之前。¹¹⁰她记得在轰炸中为病危的丈夫找药，并记得丈夫死于同一年，当时是 30 年代末。但是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都表明她丈夫死于 1941 年，那年的九月有日全蚀（她不记得了），而不是轰炸。¹¹¹国民党不可能去轰炸一个自己掌控的地区，而日军也正在远离渭南的地方捉襟见肘、裹足不前。

尽管竹香的个人历史和更大的事件并非完全吻合，她的故事却说明了和她那一代的妇女是如何去理解她们自己的生活 and 更宏大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竹香很可能是在 30 年代末历经了这几次轰炸事件。1936 年，国民党轰炸渭南的时候，她结婚并有了身孕。丈夫在外做长工，她负责家里所有的农活和家务。1938 或 1939 年，日军轰炸的时候，她很可能正在外面为两岁的女儿找药，女儿当时差点死于麻疹。通过把轰炸事件和丈夫的临终时刻糅合到一起——尽管两者其实相隔数年，竹香将当地战争的一次重大事件和她个人的最大损失放到一起。这个损失决定了她后来走上了从一个恪守妇道的寡妇变为农业领导者的道路。山秀珍逃离了灾难性的大饥荒，穿山越岭，露宿坟墓而不知自己走失的母亲就在自己身旁。跟山秀珍一样，竹香也讲述了一个详细的、充满了画面感的故事：泡豆芽的深坑，财东家坟墓提供的避难所，她煮羊血时炉子上快熄灭的火。她将自己放在一个充满了恐惧、不幸和鲜活的记忆碎片的场景中，虽然害怕但却坚定，决意要拿到药并光荣地完成她对家庭的使命。在她自己的讲述中，她是一个未被歌颂的无名英雄，当时的女子本应待守在家，但她在外四处行走奔波。

曹竹香的故事表明了征兵和战争、以及疾病和死亡是如何造成了大批家庭的消亡，并改变了人们对女子的预设。男孩和男人每次冒险外出都有可能被抓壮丁。1942 年十月，渭南县政府将抓来的壮丁捆绑起来，扔到当地一个着火的钢铁厂过了一整夜，最后死了二十四个，四十多个严重烧伤。八个月后，来

¹⁰⁹ 她二妈是公公的寡嫂，也跟他们一起住。见第三章。

¹¹⁰ 渭南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17、18 页。

¹¹¹ 曹竹香生于 1918 年 9 月（渭南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617 页）；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出生日期是按生肖年马年、而非公历年来计算的，即 1918 年）。按照中国年龄的算法——在出生年算一岁，并每次农历新年后叠加，她订亲和成亲时为 17 岁。根据这个思路和她告诉我们的有关她孩子出生时间的信息，她于 1934 年结婚，1937 生下女儿，1940 年末生下儿子。她儿子出生后丈夫才死。50 年代初，当竹香首次成为当地农业领导时，有关她的材料都说她丈夫死于 1941 年。见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妇联 178-27-025（1952 年）；妇联 178-209-009（1953 年）。1941 年 9 月 21 日，出现日全蚀：“星星出现，鸟雀乱飞，鸡犬乱撞”（渭南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19 页）。

自陕西省东部的八百多个麦客在渭南被抓，并被移交去完成当地的征兵指标，虽然后来省里的有关当局在发现他们不是本地人后，很快将他们释放。¹¹² 竹香也记得一个邻居用斧头砍断他自己两个指头的事。如此一来，他就没法开枪，因而也就不会被征募入伍了。¹¹³

许多加入国民党军队的男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疾病、饥饿、或由于企图逃跑而被处决。这些男人的死使家里的劳动和其他一切都靠女人。然而，即使丈夫死了，征兵也依然威胁着这些家庭。40年代初期，曹竹香的丈夫死后，但她六岁的儿子也被列入征兵的名单。人家按人头派呢，按娃子娃（方言：男娃）派泥……就我事先尽量给借钱，就外还是没钱。那时全凭我哥给几个钱，咱也不能老跟人家要，一年拾些棉花，卖些钱给人家出，地里的活纺棉纺布卖些钱给人家交。¹¹⁴

躲藏

冒险外出让妇女们面临着被绑架和强暴的危险，然而待在家里也没有提供多少保障。土匪¹¹⁵、非正规军和正规军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他们对待乡民的方式也没有多少差异。在男人逃走了或被抓走了的人家，年长的妇女加固门户，将自己看管的女孩和年轻姑娘乔装改扮、或让她们躲到田野里和大坝里。生于1912年的冯娜回忆说，来自士兵的性威胁跟没有男人有密切关系。都十五六了。那来了，就叫跟上走呀，当太太，吓死了。把我吓的蹶到 nie 这。那会子屋里

¹¹² 这些男人分别来自商县和 Z 村所在的丹凤县，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 年：第 19、503 页。

¹¹³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¹¹⁴ 同上。

¹¹⁵ 台克满（1921 年：第 74-76 页）生动地描绘了 1910 年代陕西的土匪以及他们和士兵之间的可互换性。军阀时期（1916-28 年）可能是土匪最猖獗的时代，但由于国民党无法迅速对陕西实行有效通知，匪患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贝思飞（[Bilingsley] 1988 年：第 30 页）写道，“军阀统治时期，陕西成为各色暴徒的领地，从农民起义者到军阀支持的土匪部队和地主民团。……陕西北部是多次农民起义的诞生地，其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常常受到土匪的骚扰。民国时期即使在富饶的渭河河谷，也长期存在有势力的匪帮。虽然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字，但陕西省在 20 年代中期的土匪人数无疑有好几万。陕西与甘肃、宁夏、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和四川交界，因此也不断遭到外部匪帮的入侵。”有关陕西民国初期的土匪，见冉光海 1995 年：第 9、19、80、111-14、136-37、187-90、208-10 页。有关 30 年代的土匪，见李云峰、袁文伟 2006 年，特别参看第 454-57 页。他们估算陕西在 30 年代中期的土匪人数超过十万（第 454 页）。

有外前人还强，没外前人不就行。¹¹⁶ 1927年，冯娜居住的合阳县驻扎了来自至少七个不同军阀的二万六千名士兵。¹¹⁷ 难怪冯娜的记忆如此深刻。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稳定陕西农村。1932年，一个叫李长有的河南人率乱军 5000 人进入陕西东南部，在 Z 村停留了一段时间并在几周后击溃了当地县里最大一个乡镇的两个民兵团。李的队伍占领该镇达半年之久，抓来当地男子逼迫他们从事徭役，奸淫妇女、恐吓当地人民、无恶不作。李长有军在每个俘虏男子的左臂衣袖上刻一个窟窿，拴上一根绳子，以后如果该男子逃跑，只要发现这个标记，即可一眼辨认出来。在李军与当地保安团队的一次武装冲突中，500 多个被俘虏的男子死于两军交火。后来李长有军为国民党杨虎城的部队击溃，剩余部队被迫逃往四川。但李军在逃窜之前，又再一次经过了 Z 村。李长有统治的半年间，当地村民庄稼未收。当地方志称，约有 2 万乡民的房屋被焚毁，死亡者逾 2700 人（死于当年瘟疫者尚不在内），2000 妇女被李军奸污，1600 名青壮年男子被虏走，2000 头耕牛遭到宰杀。¹¹⁸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灾难和逃亡故事。颜盼娃当时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亲眼看着自己五十岁的父亲被李长有的军队抓走。他死了，尸首都没有找到。¹¹⁹ 刘冬梅的母亲在怀着她的时候逃进了深山，回来两个月后生下了她。她母亲对她说，李军见人就杀。¹²⁰ 董桂枝当时十多岁，她关于那些年的回忆都是围绕着如何逃避李军展开的：躲开李长有后，我二十多时结了婚。全家在山洞里藏了两三年。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两个土匪在村里晃荡，村里人就人去把他们赶走。如果人多，我们就不敢去。土匪烧了我们整个村。¹²¹

Z 村附近的地区仍旧受到土匪和士兵的骚扰。李朵朵和她五个妹妹在 40 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躲西藏。这天刚一黑，我妈和我爸把所有的好东西，绸绸缎缎都个我这小的一个个都弄到身上，弄多大（形容大）的大衣裳穿上，带不动，以防土匪来了好贮备。成天我爸就背个背笼，把锅都提下来放到背篓里。褥子被子成天都捆着哩。今没事了，我妈把饭做的一吃，有动向就背的东西就走啦。狗要是一叫，人都跑了，走了晚上半夜都走啦，那狗要是不叫，人都在。

我记得我七岁的时候，我三个女孩子到地里去挖野菜。回来连一个人都没有啦！我那原上有个大台，台前头有个大树。站到那台跟前，能看见那一二

¹¹⁶ 与冯娜的访谈，2001 年。

¹¹⁷ 当时是北伐时期。1927 年冬，G 村和另外三个村的农会联合出击，分别活捉和击毙了两个匪营长。直至 1928 年 7 月，国民联军至，合阳县的军阀混战局面始告结束（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12 页）。

¹¹⁸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1994：第 485 页。颜盼娃（1999 年访谈）说李长有军在 Z 村盘踞了四十一天，并在当年的农历九月再次返回。颜的说法与文字资料相一致。

¹¹⁹ 与颜盼娃的访谈，1999 年。

¹²⁰ 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 年。

¹²¹ 与董桂枝的访谈，1999 年。

里路。一二里路的下半边，能看见人影影，你就知道事情不对啦，这儿人就跑啦。我们四个女子你拉我，我拉你，也不要那笼子啦、篮子啦，上那大沟。大沟那崖多大的，崖前面长的是草，坐到那里头，能把人挡住。我把我爸和我妈寻着，我才看见我大（叔）背了这么大一个猪，有百十斤的猪。我记得把猪嘴一扎，怕猪叫，背到脊背，锅在猪脊背上扣着哩。

小伙子现实晚上跑。走的时候，我爸一个跑，主要是拉小伙子哩。这样已走了，把我妇女和娃子女子就摔啦。¹²²

最让 Z 村村民害怕的是一支 40 年代抵达的叫“老魔海”的部队，该部队的士兵来自南方，很可能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部下。¹²³ 李朵朵当时七岁，她回忆道，老魔海来了，说话他就听不懂。咱骂他，他听不懂，他骂咱，咱能听懂。谁知道那是啥地方人，说话叽叽嘟嘟的一点都听不懂。那时小不知道叫啥部队。那来了，鸡、羊、猪集弄到那儿。¹²⁴

年长李朵朵三岁的肖改叶，对这些士兵记忆却是跟性威胁有关。我知道我还记得，我睡到这地道里，人爱来了要搂被子，我婆说他来了你把头捂严，他来搂被子，我婆说我女子难过哩呀（有病）你不敢揭被子，不敢揭哟，人家来把被扯成绺绺子打鞋子，打鞋穿了，那国民党怕怕呀，到门上要喝水，你坐门前都不敢动弹，他叫你动弹才敢动弹，人家要喝人还怕毒死他，他说你先喝，一碗都喝一口了才给人家递哩，国民党不是个人，那我记得。¹²⁵ 一直到 40 年代末，逃亡依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逃到那石门水沟，黑夜晚上都在那山上睡着哩，从广东、广西来的那‘老魔海’（绰号），那你家的那小女子啥罗，把你

¹²² 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 年。

¹²³ Z 村的几个妇女都用了“老魔海”这个词。从 20 年代起到 1949 年国民党被迫撤离大陆，白崇禧时而为蒋介石的联盟，又时而为蒋的对手。抗日战争时期，白为副总参谋长和副总司令。1941 年 11 月，白崇禧宿于商县最大之乡龙驹寨（后成为县城）。1943 年 6 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为“桂系”的另一位成员，此后不久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并在随后暂行中华民国总统之职），视察防龙路经龙驹寨。1944 年 11 月，国民党抗日前沿指挥机构由商南县迁驻龙驹寨的陈家村。时由安徽人郭寄峤主持（《丹凤县志》1994 年：第 23-24 页）。白或李可能都将广西部队带到了商县附近，国民党抗日前沿指挥机构也可能将南部的士兵带到了 Z 村及附近地区。

¹²⁴ 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 年。

¹²⁵ 与肖改叶的访谈，1999 年。惊人的是，有关共产党部队的故事中并没有那些弥漫在许多有关军阀、土匪、国民党军队的故事中的性侵害的意味。我们听到的一个与解放军部分有关的带有性暗示的故事，是来自于一个解放战争时期住在陕西省西南部与四川交界的旗山的妇女。共产党的部队当时住在她家。她回忆说，解放军战士们唱了一首歌，歌词说“只要革命成功了，每个送个女学生。”但她接着解释说，1949 年后共产党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解放了妇女（与欧阳秀的访谈，2004 年）。

那门打烂。男的叫跑壮丁，一拉去了，人家用那摩子把你磨青把你那蛋托给你托了。女的跑，他就是那，那侮辱的。这时候，你抓再多女子都不害怕，旧社会，抓一个女子都吓死了，女子可怜，哪儿来个啥喽就叫跑了。¹²⁶

解放

共产党的到来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他们到达每个村庄后，都紧随着当地不同的历史。那个让他们的出现广为人知的“解放”一词，当时对村民们还不具备它后来才有的那些意义：一种承诺，长久以来饱受饥饿和强盗威胁的日子的结束，过去和将来之间一条光明的分界线。当解放到来的时候，其历史还未被书写，但那段历史如今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故事的讲述。

对山秀珍来说，一个极其可怕的日子成了解放之前的国共战争的标记。47年共产党在咱这儿东店，咱这儿太要口，就只有四个口村里住的是国民党部队，那（指国民党部队）在陕口城里头住着呢，城外住的是八路军。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部队打了10天。

我那时在我老屋呢。屋里就没人，村里人都跑光了，我屋就是光剩一个我，儿子连他大也跑了。有十一、二点钟，太阳坡正晒着呢。和我九姨在门口，那飞机飞的低的很，就这房檐高，我说好厉害呀，快回，就赶快往回跑，她还没回屋，门口有个磨房，她就钻进去，我刚到我门口，进了街门，这也隔墙就扔了个炸弹，这粗这高，两头尖尖，撩下来没响，把隔壁石榴树枝都炸坏了，响没，撩到我哪边隔墙子（隔壁）一个园的，是园旦，园疙瘩，掉到早茅子（厕所）了，把早茅子的粪都打到我这边院子，打了一院子的茅粪，那会儿我刚进门，一股烟气一下子把我呛住，我扑倒了就啥也不知道了……多亏那个没响。再要响了，就不得了。我爬在院子啥也不知道，连死了一样。飞机走了，八路军就回来了。

跟陕西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秀珍那个地区在解放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被国共两党来回轮流控制。¹²⁷爆炸发生数天后，共产党的部队走了，有些往东行进攻打河南省洛阳，其他则朝南前进去陕南建立根据地。¹²⁸国民党的军队

¹²⁶ 与刘冬梅的访谈，1999年。

¹²⁷ 有关陕西在解放时期的军事史，见文安立（Westad）2003年：第150-154、254-55页。

¹²⁸ 潼关方志记载，1947年9月，陈赓、谢富治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河南朝西边的潼关挺进、阻敌东援。胡宗南部队遭到解放军的痛击并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9月15日晚，解放军并分东、南、北三面围攻善车口村，歼其一部后、撤出据点。秀珍居住的上马店村向南不到两公里就是善车口村。很可能是这场战役毁坏了她邻居的石榴树和茅房。（潼关卷1997年：第16页。；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20页。）

重新占领了这个地区。天啊！来把我这村里牛杀的吃光，猪杀的吃净，鸡杀的吃完，还说我给你打仗来啦，给你赶贼娃子来啦，我嘴没说，谁是贼娃子！见你屋里的啥他都拿。

山秀珍说到被轰炸的经历时，她的故事里出现了对国共两军占领的军事要点的叙述。这些细节她当时不可能知道，而应该是她在成了积极分子和 1950 年成为共产党员后才学到的。有关解放的故事总是沿着一条这样的弧线，即从危险、混乱无序的国民党军队，到有彬彬有礼、安静的共产党部队。例如，1940 年出生在 Z 村附近的李朵朵，就讲述了一个观察细致入微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在她九岁时发生的。那头一批来到这转了一圈，这伙子一走，那一伙子又来了。最后解放了。新四军来，咱不农村人不知道那是新四军。我着听人家说那是啥部队。电视里演的那。我都想不起来了。李先念部队、徐海东部队，那时解放了才知道徐海东部队。徐海东那部队整整过了三天三夜，人都是离三尺远一个，都是穿那灰灰衣服、戴灰灰帽子……就从我娘家门上上山。人家问我有啥粮食没有，我听我妈说：“我还有一碗子大米”。人家说：“大娘，你把你那一碗子大米给给我，你有孩子了，我给你洋面”。我妈说不要，死活不要人家那。那时候都是害怕要出事，不敢要。人家说：“那你不要我还要给你倒”。那人最后给了一布袋花生米，还有一布袋洋面。

就那我妈才给我爸带信，让我爸从大山回去。那大山沟里把小伙子都叫回来了。回来了说那解放了，解放了那啥都知道啦，知道那徐海东部队。¹²⁹

这个故事在材料上十分可靠：灰色的大衣、花生、母亲捐给藏匿在深山的父亲的口信。但这个故事描述的却不是 1949 年发生在 Z 村附近的事。李先念在 1946 年夏季带领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并在附近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但他在秋季之前就离开了此地并回到了华北平原。¹³⁰ 徐海东和他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经过 Z 村的时间是 1934 年末，这个时间比解放的时间早了十五年，也比李朵朵出生的时间早了六年。徐在一次与国民党战役中头负重伤，为了疗伤并没有随共产党的主力一起长征。在前往甘肃和陕北之前，徐试图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带领部下进行了数月英勇的游击战争。¹³¹ 李朵朵出生的 1940 年，徐海东在往华中地区发送一份军事情报时开始吐血并病倒；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徐大部分时候都在治疗肺结核，并为养病而辗转于安徽、江苏、山东、大连和北京等地。¹³² 解放的时候，虽然徐的军事才能让他在陕西仍然享有声望，他人却并不在陕西。尽管由于健康的原因，徐没有像李先念那样在中共政府拥有辉

有关上马店与善车口之间的相对位置，参见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 年：卷首插画地图。

¹²⁹ 与李朵朵的访谈，1999 年。

¹³⁰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4 年：第 24-25 页。

¹³¹ 同上，第 20-21 页。刘子潜 1981 年：第 240-43 页；徐海东 1982 年：第 35-42、78-97、130-31 页；张麟 1982 年：第 153-84 页。

¹³² 徐海东 1982 年：第 51-57、135 页；张麟 1982 年：第 260-88 页。

煌的职业生涯，他们都是著名的战争英雄。解放数年后，Z村的农民们依然自豪地回忆起二人在附近的活动。

或许李朵朵的母亲曾经见过徐海东与部下如何行军通过——排成整齐的队伍，每排相距三尺远——并告诉了她女儿徐的部队是什么模样。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所有有关这场战争的回忆录强调的都是战士的悲惨境况、食物的短缺、穿烂的草鞋、以及战士们在该地区快速快速移动的游击战。整齐的行军方阵或制服似乎都不合理。但于这场战役六年后出生的朵朵，却不但非常肯定地提供了细节，还清楚地将自己放到当时的场景中：人家问我有啥粮食没有；我听我妈说……“你有孩子了”……人家给了一布袋花生米。在她这个引人入胜的关于解放的故事里，最具启示性的话或许是那句“电视里演的那”。1999年，我们对朵朵进行访谈时距长征的五十周年纪念已过去几年，当年也正好是建国五十周年。一个几乎连室内管道系统都没有的村庄，却在每个巷子里都放了一台电视机，朵朵肯定看到了许多赞美共产党军队英勇事迹的节目。村民们谈论解放的细节时，事件、记忆、和事后的添枝加叶不再是分开独立的。故事的可靠性最后证明是虚幻的。

与生动、却不可靠的关于大部队行进故事相比，对家庭困境的记述便不那么戏剧化，但却更令人不安。对张奎来说，国共内战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挺进Z村。张奎于1917年生于Z村，是附近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据说张奎早年曾因一时受辱而跑到深山里：不知叫谁给他打了几耳巴子，生气才跑的，那把他哥，把他嫂子，把他妻子成天压到那地下，那些人哦。¹³³张奎加入当地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军事武装团体，但是直到1945年末，他才归顺共产党。¹³⁴

张奎在附近的山里安顿下来之后，村里其他人便去投奔他，以致他们的家人也遭到骚扰和报复。村民们去投奔他的原因并不总是政治上的。何改珍的哥哥有次出去买烟草时途经张奎占领的地区，此后便再也没有返回Z村。后来她哥哥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丧生。我妈可怜的成开哭哭啼啼的，到那河，人家就把我那衣裳拿到河滩滩莫得人的地方就哭去了，那保甲把我整的，我都吃不成饭那，转过来，土匪他妈，转过去，土匪他妹子，那做的饭你都吃不上，人家成天寻过来寻过去，把碗端完，莫啥端就拿水瓢。保甲知道你哥去打游击。直到1949年，改珍的家人才重新找回她哥哥的尸体，并将他葬在一座矗立于Z村山上的烈士纪念墓里。¹³⁵

¹³³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¹³⁴ 有关1940肖同福在Z村地区领导的当地自发武装斗争的历史，参看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第480页。张奎于1941年成为肖部下—支队伍的首领，中共地下党组织试图招纳肖同福部，未果；不久后，国民党部队向肖同福“游击队”进行了合力围剿。活捉了肖和张奎等各支队长的家属及亲戚。张奎同另一支队的队长坚持不降；张其后加入共产党队伍，并成为“商洛地区革命武装骨干之一”。

¹³⁵ 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年。

郑秀花的父亲在 1945 年左右加入游击队，当时她十五六岁。¹³⁶ 几年后，一个国民党士兵要求秀花嫁给他。不敢，不敢人家用枪打。那第一批是拉锯的，怕人家把我一家人都打了，我可怜的没人管，谁管哩嘛，那我爸不在么，他要在屋里，他不敢。秀花很不情愿地嫁给了那个士兵，跟他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到了她生下孩子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夺取了这个地区，她丈夫也已遭到处决。孩子出生后只活了几个月就死了。不久，秀花的父亲从山里回来，但不到几年后他也死了。在游击队的那些年弄垮了他的身体。¹³⁷

黄河西岸的合阳县，也成了一个来回战斗的场所——村民们将那些战斗称为“拉锯战”。1946 年 12 月，一个保安团团团长杀害了四名游击队队员并将他们的人头悬在县城南门示众。到 1947 年末，合阳县有了自己编制的游击队武装力量。1948 年春，人民解放军两次解放县城，合阳县获得彻底解放。¹³⁸

乔引娣描述了国共两军引起的恐慌。像山秀珍和曹竹香的故事一样，她在故事也将自己放在一个视觉上令人震撼的场景的中心。她直到后来才明白这种场景的历史意义。我记得一回，我到涝池洗去了。¹³⁹ 那就都十六、七了，十七了，那就大姑娘了，辫子长的，后边掉上那辫子。我妈他们在场里扬谷子哩，咱吃饭的米，我在涝池洗就没看，我妈看涝池两边全立的队伍，我妈吓得就叫我，我抬头一看，把我吓得，不知道走哩，还是……我提的穿的多，还泡下那些穿的，没方子闹，那吓得没见过那些队伍。

我妈紧赶把我从涝池沿上吊，把我急得在那儿就摔了几跤，掉到涝池腿都泥了，就湿了，把人吓得不知道该啥。最后，拉到场里上来，队伍全围了，那时候大姑娘就走不脱，我妈吓得一下把簸箕给我扣到头上，我妈和我娘抬一担谷，一下抬得叫我头到……把担的谷倒得不多，吓得把我才弄到屋里，到屋里你叫门哩，他叫门哩，我记得我那会儿，有一个搁粮食，搁麦子的仓，……先紧赶把我闹蛭那上头，扣一个大蒲蓝，把那口口一挡，一挂，才敢给开门，但见了就走不脱。

¹³⁶ 与郑秀花的访谈，1999 年。张奎在这些村民们的故事中比在官方记载中占的分量更为突出。何改珍讲的故事并没有说张奎跟八路军的正规军相比，是多么的无纪律和残暴，而说张是当地一个记仇的人。据说在迂回的战斗中，他吃了一个富农一头猪后离开了，说日后再还。当国民党部队回来时，这个富农和妻子攻击并咒骂张奎的妻子（或许是他的小妾）。后来张奎回来了，据说将富农的妻子和儿子都杀了，但具体的细节有些模糊不清楚（与何改珍的访谈，1999 年）。

¹³⁷ 同上。Z 村地区的战斗持久且激烈，但最终张奎的部队获胜。有关这个地区战斗的具体细节，见丹凤县之编纂委员会 1994 年：第 488-90 页。

¹³⁸ 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 年：第 14-15 页；张铁 1982 年；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 年：第 309-11 页。《合阳文史资料》第 2 辑（1998 年 10 月）辟专刊纪念合阳解放四十周年，专刊涵括了在合阳县战斗过的游击队员的回忆录。在专刊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当时革命烈士的名单里，并未提到 G 村，也未提及任何 G 村的人。

¹³⁹ 有关什么是涝池，见戴应新 1977 年：第 9 页。

拉锯以后再没有的，也听人家大人说哩，听大人说，中央军一解放再不来。

在渭南县的 B 村，¹⁴⁰ 国民党军队驻扎在 B 村所在的渭河南岸，共产党的军队则在渭河北岸。已守寡并成为家里劳动主力八年之久的曹竹香把家人都锁在家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把门一关，把我娃，我亲妈，连我那个兄弟，我妹子，我几个认定到后头，那可是人心惶惶，我随手做的一吃，就到地里，娃连我二妈呆到屋里，我亲妈牺怕的，那土匪黑了来把吃的背上走了，把她吓的又是吐又是拉，我给我亲妈说，我在后边枣树上，娃在底子，你把娃小心着，有啥不对，咱翻墙就跑，跑出去了。就这样，到最后的那一晚上，都三天三夜，从那门那儿过来。逃军过来了。咱农民都在麦地里藏着里，我和婶咱俩家没有外前人。在那一天是把害怕受扎了。

那晚上，害怕得很，我给我婶说，咱跑不利了，出门就是井，咱就往井里一跳，这村里再没有得人，那怕死了都不受他的那个。

我到门连顶带锁，顶了几个木头，我在房上趴着哩，见村里那拿枪的过来了，过去了，那是拉人哩。国民党拉人哩，寻牲口哩，把我那楼门底下砍的豁害牙牙的。至今都是那样。到底那门也可没有弄开，到第二天，国民党那军队不是一下都跑完了么。八路军来了。¹⁴¹

据曹竹香回忆，解放是从向共产党的战士们提供食物这些试探性的互动开始的：就给人安顿，叫给八路军泡菜，就马上部队就过来了，家家都给泡几盆菜。不住，该做的工作都教一教，说一说就走了。以后麦收了，到忙后了，才那才慢慢正规了，有的男的还到县上看哩，那县上都打的烂的，那忙后，我还跑到那达看去了。人都骂一骂，说一说，宣传的那就宣传哩，街上那一截一截都跟的群众，那人多，就给群众讲，街上也有卖凉粉，gege，小吃食的，那八路军也买的吃哩，他一买，把钱一给还给的多，人还吓的不敢要，不要还不行，以后慢慢地你给钱他也接哩。国民党那时把你那往完的吃、连吃带提的，谁还给你钱哩。¹⁴²

共产党夺取渭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稳步地从西转向秀珍所在地区。国民党部队从潼关县城城墙展开激战，但于 5 月 29 日放弃抵抗。6 月初，等到解放军包围了从潼关县城到上马店秀珍家之间七公里左右的地区之后，所有的

¹⁴⁰ 有关 1949 年 6 月共产党在渭河河谷的胜利的叙述，见胡顿 (Hooton) 1991 年：第 166 页；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312-13 页。

¹⁴¹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我们所访谈的村子中，只有 T 村在易手时没有在附近直接开火，或许是因为该县直到 1949 年 12 月初才解放，其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两月（南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 年：第 16 页）。

¹⁴² 同上。

抵抗都停止了。据她回忆，没有人开枪。跟日军的炮轰和国民党的轰炸相比，解放是安静地发生的。¹⁴³ 作为一个“老年妇女”，她关于共产党最深刻的记忆是他们恭敬地问候所有的妇女，无论她们是什么年纪。秀珍那时三十六岁，已经埋葬了她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并独自一人在潼关耕作了十多年。

家里没人

从中共政府入驻关中和陕南地区伊始，官方文件便注意到妇女的流动能力，但这些文件选择聚焦于“妇女幽居在家”这种定式，搞得好像后者才是普遍的做法似的。一篇报道在解放数周后写到，妇女对是否参加农活感到犹豫，因为她们将之视作是男人的工作，女人做是不体面的。报道紧接下来的一段却又提及，陕南的妇女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关中的妇女则从事一些季节性的农活并整年都从事纺织工作。但报道结尾只为第一种现象提出了解决方法，声明国家组织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妇女们认为劳动可耻的态度。¹⁴⁴ 这类宣传一般采取的形式是：先谴责让妇女与世隔绝的封建做法，然后歌颂她们如何进入田野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从而为一种普遍存在却遭到诋毁的做法寻求社群的认可。

与半个世纪前晚清众多改革者们的看法一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将妇女的与世隔绝看成是压迫的封建秩序的典型特点。党和国家号召组织者们击退将妇女束缚在闺阁内或娘家后院的封建主义势力。党和国家动用当地干部去让担惊受怕的父母和公婆们相信，女子在非亲属的男人面前出现并不会威胁到她们的品德。党和国家还鼓动新婚妇女们摆脱婆婆们的各种控制。这些控制要么是保护性的、要么是带有不满的、要么则是惩罚性的。接下来的两章会表明，关于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的妇女解放的常规叙述认为，革命使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到外面去的机会——去参加会议、到田地里干活、上扫盲课、去别家串门。于是，解放对农村妇女而言，是一场进入此前被禁止的社会空间的运动。

从这些层面上去界定解放必须做的，是忘掉女孩和妇女们已经是在公共空间里这样的事实，也必须忘记她们并非是由于政权的更迭和国家的号召才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内。诉苦的模式强调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苦难和剥削，但却没有突出以下这些方面：男人的缺席及其同灾难之间的紧密联系，妇女在家里从

¹⁴³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4月份开始撤回潼关地区，成功地在5月份控制了整个陕北地区、西安、以及处在河南西端边界的潼关地区。秀珍没有提及发生在6月25、26日的一起暴力事件，即国民党残余势力袭击了数个区人民政府，包括离秀珍家不远的太要区，并杀害了六名共产党员的事件。（潼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20页。）

¹⁴⁴ 妇联 178-106-005，1949年6月20日。新成立的妇联在陕西解放不到三周后发表了这份报道。这种公认劳动可耻的态度需要更仔细的推敲。罗丽莎（[Rofel] 1999年：第72页）在其对杭州丝绸厂女工的研究中指出，内/外的二分法不能映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对公共的文化两分法”，她还指出“内/外不是建立在认为家务劳动不是劳动这种错误的认知上”。曼素恩在其对帝国时期的研究中也持相同观点。1949年以前的杭州妇女和男性家庭成员一起在家庭作坊中生产丝绸，但这并未挑战公认的社会性别活动的概念。只有当妇女“外出”去跟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一起工作时，她们才不被人尊敬。罗丽莎指出，老一代的工厂女工对1949年之前的记忆里仍然带有羞耻感。罗丽莎认为，解放带给这些妇女的不是改变场所（她们已经在“外面”），而是不会感到耻辱的“外面”活动（第64-80页）。

事的劳动，如果不是妇女纺织许多家庭就无法交税这一事实，妇女们为了不饿死，外出去干农活、卖东西、工作、乞讨、逃避、躲藏或者被卖的频率有多高。陕西妇女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但这一事实被排除在这种强有力的新国家的话语之外。最终，这一事实即便没有淡出个人记忆，也淡出了公共视野。

尽管诉苦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却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做法。妇女们采用了这种做法并将之据为己有。诉苦的故事道出了本来可能根本无法用文字形式讲述出来的创伤性事件，并将这些创伤归罪于革命前几十年间扭曲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诉苦不再把这些创伤归因于“宿命”，而是有力将它们放在苦难的过去，鼓励妇女把当下看成是由她们在仁慈的党和国家的指导、保护和鼓舞下的行为塑造而成的。当妇女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距离实际情况的发生已有半世纪之久，她们对这些苦难的故事付出了极大的投入。甚至对那些从未经历过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人来说，“封建社会妇女幽居隔绝”的主题也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对压迫的解释。这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的原因。

诉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伤痛，用受封建禁锢的苦楚去替代在危险环境下奔波劳累的苦楚。当妇女们说封建主义将她们禁锢在家里的的时候，她们说的是一种对妇女的社会成规——幽居在家——她们或许曾经想要过这种幽居，但是贫困却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可以说，通过诉苦，她们拒绝了一种曾经拒绝过她们的社会规范。与此同时，当她们断言封建主义让她们与世隔绝的时候，她们也声称这种社会规范曾延及她们，她们曾经也算得上是让人尊敬的、有美好品德的女子。这类女子本应该受到庇护，免遭伤害。¹⁴⁵

这些故事带上了地域、世代差异的印记。¹⁴⁶ 在 1949 年以前就已经结婚或守寡的妇女比年轻一些的妇女更有可能自己承担主要的农事活动。山秀珍、曹竹香、以及其他妇女，讲的最多的就是女孩子被关在家里的事，这或许反映了一种在十几二十年后已经开始变化的社会规范。也正是这些在我们采访她们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妇女，讲起女人在田地里干活时的羞耻，尽管有时她们的羞耻感似乎更多是跟自己的农耕技能有关，而不是因为违反了封建的社会规范。曹竹香谈起丈夫刚死不久后的日子时说道，咱学的犁，我妈跟我斯干上（方言：一起），我嫌犁得行子不端，嫌怪（方言：不好意思），就晚上犁。¹⁴⁷ 由于同贫困和潜在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妇女出现在社会空间的现象常见但却不被提倡。这可能是为什么尽管妇女们在描述一个她们并不被隔绝的世界时，仍然不断声称她们在 1949 年之前困囿于家中庭院一隅的原因。

¹⁴⁵ 她们一面拒绝这种定式，一面又与之妥协，通过重新定义“外出”的界限而要求获得尊敬。本书开篇提到的烧毁了钞票的张朝凤（2001 年访谈）说她在结婚后没离开过家：不出门，除非他到亲戚家，他姐家。下地去摘棉花，收麦，平常收麦。我不上街。

¹⁴⁶ 秀珍和她在陕西西部的邻居们很可能在 1928 年大旱的时候旧逃离了家乡。像存雨和谷雨这样的河南人在 1942 年饥荒时进入陕西东部。Z 村地处陕西省东南部局势尤为不稳定的一个地区，最常见的就是躲避土匪和士兵。很多妇女都将她们的线、布匹以及针线活卖到南部的市集而不是中部地区。李六斤（1997 年访谈）和李秀兰（1997 年访谈）都说到了南部的市集。有关关中东部 G 村的市集买卖，见杨贵石（2004 年访谈）提到的他的寡母和其他妇女在市集卖布的故事，以及雷彩娃（2001 年访谈）谈及和母亲一起去市集的经历。

¹⁴⁷ 与曹竹香的访谈，1996 年。

我们或许可以为有人走近一户人家、而屋内的女人喊道：“没有人在家”这则轶闻想象一个不同的背景。“没有人在家”在中文里经常用作“家里没人”，意为“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这个故事被用来说明妇女不将自己看成是人。然而，当妇女们讲述自己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时，“人”字经常用来指男人，“没人”经常用来描述家里没有壮年男性劳动力。曹竹香在解释为什么娘家比夫家宽裕时指出娘家有两个兄弟，但“这儿是没人”，尽管她的夫家有两个成年女人、她的少年丈夫及几个未结婚的孩子。

从这样的语气里听到，“家里没人”的说法便不表示一个女人是在贬低她自己的人格，而是仅仅表明她被扔下，去自己照顾自己。她喊出“家里没人”的时候可能正坐在织布机前，女儿或儿媳在身边纺线，生产出物品去换取粮食养家或为儿子赚取买丁钱或买回她交给地主的一部分收成。养家都指望着她。家里没人。

诉苦的故事尽管强有力，却远不能为妇女们的生命提供一个充分的叙事框架。它作为唯一的革命自述模式已经将注意力从许多重要问题上移开，诸如革命进程一开始是如何被理解的，又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记忆、被修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妇女可以在农村及以外的空间更安全地走动，她们学会了拒绝那些关于女子受到尊敬的观念。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她们在1949年之前可能也会遵循着这些观念。她们也学会了将自己过去的故事错记成是一个生活封闭而不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故事。这么一来，她们间接地强化了妇女幽闭在家的美德，尽管她们其实是在谴责这种美德。

1949年之后，党和国家使公共空间变得更安全，而此同时也在那个空间里提倡、颂扬并最终需要妇女的劳动。这是一场伴随着重要沉默的巨大变革。正如接下来的章节会表明的那样，正如它们曾在解放前的苦难故事中的情形一样，集体化时期家庭空间内的劳动，以及很大程度上未引起关注的、男人很早离开农事活动并深刻影响了妇女的工作生活这一事实，仍然会在解放后的官方叙述中不见踪影。